



总第 94 期

94

2021 年 | 第 5 期 |

深圳市律师协会主办

(粤 B) L017010071

SHENZHEN LAWYERS

深圳律师

—— 非常视线 专业见解 ——

接续启航 奋斗新征程

深圳市第十一次律师代表大会圆满举行

读懂综合保税区与自贸试验区 为大湾区涉外法律服务贡献海关法律智慧

居住权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实务解析

三胎时代，谈谈女性生育权和不生育的自由

深圳市第十一次律师代表大会

深圳市第十一次律师代表大会

新一届深圳市律师协会工作团队亮相



第十一届深圳市律师协会理事会名单

会 长：张斌

副会长：杨道、章成、赵东川、王伟、罗振辉、曾迈（女）、胡宁可（女）、黄远兵

理 事：任杰、李军强、辛先霞（女）、孙春桥、刘国江、李鲲、任松岭、梁华、潘翔、孙程旭、杜芹（女）、赵广群、温贵和、楼洪、王寿群（女）、乔瑞、许宜群、马卓檀、潘春明、程建锋、黄庆礼、孟荻（女）、高文杰、彭学武、李凯、周敏（女）



第七届深圳市律师协会监事会名单

监 事 长：曾常青

副监事长：刘鸿、吴小波

监 事：李继承、李斌泉、邹红芳（女）、邹俊亮、宋校红、林志平、卓圣国、赖智欣

风雨兼程百年路，不忘初心再出发。在举国上下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深圳市律师协会圆满完成了换届选举，组建了第十一届协会工作团队。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新一届工作团队接过接力棒，应以何等的新姿态带领全体会员在未来的新征程上跑出加速度，这是我们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在此我提出以下“六个”新发展理念，与大家共勉。

一是坚持“一切以会员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会员是我们最大的根基，我们一切工作要以会员满不满意为评价标准。要准确把握会员的“真需求”，为会员提供“真服务”，把协会打造成会员温暖的娘家，让“协会是我家，建设靠大家”成为会员的共识。

二是坚持“共建、共享、共成”的共治理念。上下同欲者胜，传统律协的治理模式的弊端在于少数人参与治理，会员的协同性、响应性不够，协会忙于事务性工作，没有打通与会员联络的最后一公里，迫切需要引入全员共治的理念，让更多会员通过多样化途径参与到协会的治理中，逐步构建起全体会员参与律协治理的新模式，让会员与行业发展同频共振，在参与中成长，走向成熟。

三是坚持“大联合、大外交”的开放理念。通过

长效机制的构建，建立常态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良性互动机制，不断优化律师业发展环境；通过开展专业和公益外交，建立跨行业合作机制，不断开辟法律服务领域；通过开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建立大湾区城际之间深度交流与合作，互利共赢才是发展之道。

四是坚持“回归专业、服务大局”的发展理念。专业是律师的看家之本，业务是律师的立命之本。协会的工作要回归专业、回归业务，要把更多资源投入到专业化建设中，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业务发展中，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社会。

五是坚持胸怀天下的国际化发展理念。深圳建设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要求深圳律师调整发展坐标，不能只求先行先试，还要领跑，我们就必须对标国际，向国际先进看齐，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六是坚持高质量的发展理念。我们要凝心聚力地推进解决深圳律师业发展不平衡和不均衡问题，努力让深圳律师业专业化程度持续提升、规范化发展不断增强、规模化水平有效提高、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国际化水平显著提高。把深圳建设成为创新能力最强、执业环境最优、服务水平最高的全球法律服务枢纽城市。

谋事在新，谋事在早。坚持新发展理念，开好新局面，实现新作为，是我们新一届工作团队的责任和使命。在未来的新征程中，我们将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着眼全局，统筹规划，以担当为基石，以实干为本分，全力推动深圳律师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深圳“双区”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斌 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

新征程 新理念 新姿态 新作为



印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0 日

编委会主任 张 斌
编委会成员 杨 逍 章 成 赵东川
王 伟 罗振辉 曾 迈
胡宁可 黄远兵
主编 杨 逍
执行主编 侯昆霖 周 敏
栏目编辑 周争锋 陈 伟 杨新发
陈旭绯 颜宇丹 杨银笛
胡 聪 屈文静 刘伟健
责任编辑 王 颖 伍春红
编辑 黄红珍 杨 柳 翁瑞婕
美术编辑 蔡永军
电话 0755-83025789
传真 0755-83025177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1 号时代金融中心 20 楼
邮政编码 518048
电子信箱 shenzhenlawyers@163.com
印刷单位 深圳市彩霸美印刷有限公司

特别说明：《深圳律师》发表的文稿所表达的观点，
纯系作者见解，不代表编辑部的意见和立场。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 FOREWORD P1

01 新征程 新理念 新姿态 新作为 / 张斌

特别报道 | SPECIAL REPORTS P4-19

04 接续启航 奋斗新征程——深圳市第十一次律
师代表大会圆满举行

论道 | DISCOVERY P20-33

20 读懂综合保税区与自贸试验区 为大湾区涉外法
律服务贡献海关法律智慧 / 封海滨
24 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的法律研究
/ 谢烨蔓
29 推进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工作机制和体系强化之
构想 / 钟胜荣



拍案 | CASE AND EXAMPLES P34-37

34 华澳信托民事赔偿案的法律思考——基于刑民
交叉视角和程序法的展开 / 安健 陈铭 陈凯君

实务 | PRACTICE P38-44

38 外销企业内销转型时容易忽视的五类法律风
险 / 李岚 何东闽
42 居住权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实务解析 / 刘艳华
王倩



生活 | LIFE P45-47

45 律师职场“小白”的实习心得 / 金鑫
46 二胎时代，谈谈女性生育权和不生育的自由
/ 魏倩



律协动态 | INFORMATION P48

接续启航 奋斗新征程

——深圳市第十一次律师代表大会圆满举行

2021年11月27-28日，为期一天半的深圳市第十一次律师代表大会在深圳市委党校顺利召开，260余名律师代表参加。深圳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余新国，广东省律师行业党委副书记、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深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蒋溪林主持大会开幕式。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工委副主任李玉祥，市政协二级巡视员曹秀梅，市纪委监委派驻二组组长朱正俊，市委政法委员会汪洪，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邝肖华，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周映彤，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指挥部指挥长彭国庆，市两新

组织党工委书记、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市社会管理局局长李文海，市司法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蒋小文，市司法局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任继光，市司法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郑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市律师行业党委专职书记曹海雷，以及各区司法行政机关主要领导等应邀出席大会开幕式。



余新国同志在致辞中充分肯定我市广大律师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特别是疫情发生



以来，全市律师行业积极开展“战疫有法”行动，助力依法防疫和复工复产，为化解矛盾纠纷、推动城市依法治理作出突出贡献。他对新时期律师行业建设和发展提出期望，一要讲政治，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做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工作者；二要敢担当，以优质法律服务保障重大发展战略，推进社会高效能治理，守护人民高品质生活，全力服务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三要守底线，恪尽职守，进一步提高职业操守，不断提升深圳律师品牌的美誉度、行业的影响力；四要提素质，抢抓机遇，不断提升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人才培育水平建设，着力打造新时代高素质律师队伍，为奋力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先行示范城市、把深圳建设成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地和精彩演绎地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肖胜方同志在致辞中表示，全省律师事业蓬勃发展，律师队伍快速发展壮大，截至今年10月底，全省律师人数已逾6万。在全省律师工作中，深圳是佼佼者，一直以来都走在



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为全省律师工作提供了不少经验借鉴。深圳律师认真践行执业为民的宗旨，为深圳乃至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会上，经现场投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35名，监事会成员11名，张斌当选会长，曾常青当选监事长。

蒋溪林同志在闭幕式上讲话，对大会的圆满召开

表示祝贺。他指出，今年是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关头，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刚刚胜利召开的背景下，此次大会的召开具有推进全市律师工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大意义。他向广大律师强调，一是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律师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牢记“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成为德才兼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二是要做法律业务上的“能千人”，进一步加强业务能力和创新能力，积极推动法律服务模式转型升级，拓展法律服务新领域，大力发展高端法律服务和涉外法律服务；三是要做法律执业的“规矩人”，依法合规执业、规范服务。律师协会要始终不渝讲奉献、尽职责，做律师的“贴心人”，努力把律师协会打造成服务型协会，更好地服务“双区”建设和法治示范城市建设。希望新当选的律协班子戒骄戒躁，团结广大律师，在法治先行示范城市建设新征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深圳市律师协会第十一届理事会 工作团队竞选演说摘要

（根据大会现场录音整理）



张斌（会长）

深圳进入了“双区”驱动、“双区”叠加的黄金发展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律师应该怎么做？我的答案是构建“家”文化，做好“加减法”，跑出“加”速度。

第一，构建“家”文化，让律协成为会员倾心托付、放心依赖的“娘家”。我想大家心仪的律协一定是温暖的“娘家”，而不是苛刻的“婆家”。如果我当选会长，我会贯彻以会员为中心的思想，一切以会员满不满意为评价标准，全心全意为会员提供贴心有效服务，为会员谋福祉。努力营造律协团结、包容、温暖的氛围，让会员对律协具有认同感、归属感和获得感，以共建共存的信念，推动律协由少数人参与治理，转型成为全员共治，让“协会是我家，共建靠大家”成为会员共识。

第二，围绕会员服务和会员赋能做好加减法。首先律协应该做好12项“加法”：一是加快行业战略升级，制定并落实深圳律师业战略发展规划；二是加强业务发展，一切以业务发展为依归，提高深圳律师收费标准，做大业务蛋糕，打击不正当竞争，让青年律师能吃饱饭，让中老年律师能吃好饭；三是加大横向合作，秉持大联合、大外交的合作理念，构建跨行业合作机制；四是增

加专业委员会数量，建立“大专业委员会+小研究会”模式，特别是在细分领域要有所作为，让专业委引领业务创新；五是加大对青年律师扶持力度，对青年律师实施精准扶持，推行雄鹰展翅计划，四年培养2000名精专律师；六是加大国际化建设，发挥联营所作用，打造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高地，推动深圳律师“走出去”；七是加强会员权益保障，推动修改《深圳经济特区律师条例》，加大制度维权力度，为会员提供最优执业环境；八是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建立多层次、常态化法律职业共同体良性互动机制；九是加快深圳律师品牌战略落地，提升深圳律师全体形象，打响深圳律师品牌；十是加大对律师事务所管理指导，推行律所合规建设，对中小律所管理赋能；十一是加大智慧律协建设，以科技为会员赋能；十二是加强政治引领，发挥党员律师作用，以“党建+”凝聚行业力量。

此外，律协应当做好6项“减法”：一是去行政化，打造与“娘家”匹配的秘书处；二是大刀阔斧为律师减负，凡是与会员和行业发展不利的规矩都要改；三是减少线下，凡是能线上办理的都在线上进行；四是减少专门委员会数量，不搞因人设岗，避免推诿扯皮；五是去内卷化，强力推进行业创新；六是优化律师执业纪律惩戒流程，前置合规与整改，严管中融入厚爱。

第三，我本人也要做好“加减法”。首先，要多联系会员，多调研律所；其次要调动一切资源为会员谋福祉。我将辞去卓建所主任职务，全身心投入到律协工作当中；我还将放下律师执业证，在当会长期间不再办理律师业务，以昂扬的姿态带领深圳律师跑出加速度。

面对“双区”驱动和“双区”叠加，深圳律师应当调整坐标，勇于为行业开新路，我相信深圳律师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也坚信深圳律师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要以大格局、大思维、大动作跑出“加”速度。四年后，深圳律师业务总量要翻一番，超200亿，人均超80万，使深圳成为创新能力最强、执业环境最优、法律服务水平最高的全球法律服务高地。



杨道（副会长）

我曾任十届律协副会长兼新闻发言人，一届协会现已履职完毕，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开始做副会长，内心忐忑，可以说是如履薄冰。因为，这要考验我们的心态，副会长不是官，是责任，是担当，是我们律师的“服务员”；要考验我们的觉悟和专业，严格要求我们有良好的言谈举止；要考验我们的思想和智慧，在无数次接待国内其他同行来深交流时，我们要代表深圳律师，代表深圳律师行业，在无数次活动的致辞和演讲当中要求我们要有思想，言之有物。

一届任期内感恩和我搭档的理事和各专门委，因为他们，我也为协会做了一点贡献：

第一，一届任期内三次修改律师协会章程，全国首例。

第二，56.9万人线上为深圳律协庆祝30周年的生日，全国首次。

第三，《我们深圳律师》是我们深圳律师的歌，在全国各大KTV可以点唱，唱给自己、当事人，唱给社会，全国首唱。

第四，51万人在网络上围观深圳青年律师脱口秀，全国首秀。

第五，主导开发深圳智慧律师系统，让全市的律师、律所免费使用，全国首创。

除此之外，参与主导3次行业调研、5次新闻发布会、7期青年律师研修班、7期青年律师电子杂志、7期高效工具课程、12期对话会长沙龙、26期《深圳律师》杂志、53件规范文件的制定和修改，还助力81名律师走进屏幕。

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再次为行业付出和担当。言必诺，行必果，在此，我郑重地承诺，其他副会长所承诺的，也都算是我的一份承诺。



章成（副会长）

我的竞选口号是“增收增利，共同富裕，贴心服务，普惠律师”，如果我当选副会长，我将重点关注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我将努力为广大律师增加收入。根据国际发达国家律师业营收占GDP2%的标准来算，目前深圳GDP将近3万亿人民币，那我们律师业营收应该超过600亿，现在只有100亿，还有500亿的增长空间。我要推动全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和市场化建设。上一届深圳律协设立诸如保理、保险、融资租赁等专业委员会，在未来一届，我要推动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来设置更多的专业委员会，打造一大批专业拔尖、品牌过硬、营收丰厚的律师团队。同时，以律师协会为主导，加大与各行业协会、企业集群的交流工作，进行专业律师的市场化推广，使得全行业营收得到大幅提升，力争在未来四年使得我们深圳律师业整体营收翻一番，力争达到200亿。

另一方面，我将聚焦律师的身心健康和增添福利。这几年，我经常慰问生病或有困难的律师，也多次到殡仪馆送别我们的律师，2019年那一年我跑了6次殡仪馆，每次代表协会致悼词，都感到非常痛心。努力提高律师的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减轻工作压力，也是我未来努力的工作方向。我将努力提升会员资格的含金量，在会员福利方面内引外联，拓宽合作渠道，在餐饮、住宿、出行、教育、医疗、商业服务等各个领域争取优厚的会员福利。我承诺至少促成100项以上的具体会员福利，让大家享有更多福利。

为深圳律师事业，我一定奋力拼搏，绝不退缩，勇往直前，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赵东川（副会长）

我为什么要竞选副会长？是因为经过十届理事会 55 个月的历练，投入协会超过 2000 小时的工作，让我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是因为我有广东人实干闯未来的坚定信念和四川人不畏艰难的顽强斗志，更是因为我有愿意干好律协工作、愿意为律师当好“服务员”的深厚情怀。

深圳律师业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靠各位律师代表选出一个肯干、会干、能干的会长团队。所以，我要争取这个机会，争取为行业的发展做更多的工作。

如果我当选副会长，我会做什么？

第一，推动修改违规记录规则。对受过处分的律所，在完成整改并规范管理一定时间后，可以申请取消不良记录，鼓励律所亡羊补牢，甩掉历史包袱。

第二，推行行业合规建设，探索执业律师惩戒制度改革。

第三，解决长期执业困难，提升律师执业幸福感。比如，推动法院解决联系沟通难，要求法官、书记员在办案期间与代理律师建立微信工作群，让代理律师和办案人可以畅通联系，让过去律师打电话几天找不到法官的情况成为历史。

第四，增强监督职能，提升律师行业地位。比如，推动建立律师对法官的评价机制，代理律师可通过评价体系对承办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进行工作评价，把律师评价作为法官日常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标。

我的目标是拼尽全力为深圳律师争取“多子多福”，“多子”，让深圳律师多点面子、多接案子、多赚票子；“多福”，就是为行业造福，让大家感受更多幸福，我将使尽洪荒之力，燃烧自己，点亮未来。



王伟（副会长）

我的心情特别地紧张和忐忑。上次有这种感觉，是十几年前我结婚的时候，而今天这份紧张和忐忑，是因为我要“嫁给”律协。“嫁给”律协，是我对副会长角色的理解，副会长必须像一位伟大的妻子一样，爱律协，爱这份事业，爱每一位会员。如果能“嫁给”律协，我想为协会做三件事：

首先，守护行业。每年公布深圳律师业执业状况报告，调研分析业务领域的各项数据，整理推广律所合规管理经验，关注分享最前沿的法律技术。

第二，培养新人。尝试打破以律所培养青年律师为主的传统模式，从实习人员开始，体系化激励培养青年律师，为各家律所培养有担当的接班人。

第三，持家有道。把深圳律师故事讲好讲妙的同时，让每位会员手中的执业证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健康、旅游、美食、运动等都要超过一般会员的折扣。

我凭什么让律协“娶我”呢？因为我的内在。首先，我参与协会工作 11 年，过去 4 年我带领青工委从提高职业素养、搭建展示平台、关怀职业环境三个维度服务深圳律师。这些积累和沉淀，让我对行业发展的需求和痛点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二是有合作精神，深圳律协有 26 个专门工作委员会，青工委与其中 12 个委员会联合举办各项活动，在各委员会中首屈一指。三是有时间保障，上一届律协共举办 7 期青年律师研修班，我为此倾注了 63 个周末的时间，我妻子现在陪孩子在外地读书，在深圳我是“孤家寡人”，我的时间就是为律协工作的时间。我和律协“这门婚事”拜托各位能成全，虽然我不是唯一的新娘，但我一定用心做最贤惠的那一个。



罗振辉（副会长）

我认为我可以胜任副会长，理由如下：

首先，我有行业管理和律所管理的经验，我曾任十届律协律所委主任，走访律所，深入律师，深知行业疾苦。在律所，本人 30 多岁就担任深圳百人律所主任，深知律所痛点。

其次，本人是以专业为本的律师，曾同时担任省、市两级专业委主任，而且还抽空出版了自己的法律实务专著。

第三，本人积极参政议政，本人是竞选人当中唯一的深圳市党代表，更能代表广大党员的心声。我对深圳的律师同仁们都怀着感激之情，我的成绩是大家赋予的，我必须用服务回报。

如果我当选副会长，我将积极推动以下几项工作：

首先，我将推动协会进一步花钱。虽然协会搞的是平衡预算，但协会每年账上几千万，我们要设法科学合理地把钱花出去，花在律师身上，花在国际化上，否则那就是浪费，就是对律师的“犯罪”。

第二，会花钱就要会搞钱，我将积极协同各专门委、专业委、各职能部门办更多的活动，办更多的专项，争取市、区两级政府的支持，获取更多的资助。

第三，我将积极推动协会做一次大调研。上一次行业整体调研是在 2007 年，将近 15 年过去了，没有一个好的调研，谈什么好的规划呢？

第四，我将积极推动律所交流，所不分大小，所不分本土外地，都是深圳所，我将搭建深圳律所的交流平台，促进律所交流与合作。

第五，进一步推动律协信息化工作，为律协秘书处、律所、律师、律师团队提供更多的便利。

我不会唱歌，不会写诗，也不会写对联，我只会撸起袖子干，放开步伐奋力行。



曾迈（副会长）

我有一个梦想，希望我们代理的每一宗业务都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普遍尊重；我们代理的诉讼案件，可以快速立案、快速查封保全、高质量庭审、公正判决；我们可以凭律师证充分行使调查取证权，我们成为专业、正义的代名词。我担任《深圳经济特区律师条例》修订工作小组副组长，经过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30 多次打磨、20 多次工作会议、10 余次修改，现修订稿已呈报市司法局。如果条例能顺利通过人大表决，梦想实现，指日可待。之后还有人大讨论、征集意见、表决等，还有很多难关需要一关关过、一关关闯。我认为自己是代表深圳律师攻坚克难的合适人选之一。为行业修法大事，我愿意竭尽所能，为实现这个梦想，我会持之以恒地奋斗。

我认为自己有三个方面的优势可以胜任副会长一职。第一，像老马一样丰富的协会工作经验。服务协会 7 年多，我每周至少有一天的时间处理协会事务，共计 3000 多小时协会义工时间，早已把我锤炼成为协会的资深义工。第二，像狮子一样严谨高效的工作作风。我手头每一项工作从来都是高效保质完成，一般工作不过夜，简单事务 24 小时回应，复杂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第三，像公牛一样结实的身体素质。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哪怕再大的压力，只要进入工作状态，我就是满血复活的战斗机。谢谢所有为行业发展付出的人，我愿意像大家一样继续付出，我愿意成为那道光，温暖自己，照耀他人。



胡宁可（副会长）

我为什么要竞选副会长？有三点理由：

首先，我有十多年协会履职经历。曾经担任协会副会长和理事，在此期间，我与省内外 20 余家律师协会同行交流和互动，走访过 200 多家律所，与数千名律师同仁面对面对话，我深知行业的痛点和难点。如果我当选副会长，我将致力于律协合规化建设，探索实习人员培训、考核制度的改革；如果我当选副会长，我将致力于大幅度提高会员重疾险的保障力度，适时推出团体养老险、团体意外险，增加会员幸福指数；我还会推动建立中小型律师事务所扶持基金，为中小型律师事务所的发展和壮大赋能。

第二，我有长期律师事务所的管理经验。我来自晟典，连续十多年担任晟典所的管理合伙人，晟典是本土律所之代表，我亲身经历了晟典 15 年发展壮大的历程，这其中积累的点滴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协会履职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三，我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30 余年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培养了我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我能自觉维护班子团结，搭台不拆台，铺路不挖坑，解决矛盾求同存异，处理问题对事不对人。我相信我能够成为会长团队中的一缕清风。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有强大的内驱动力，有深刻的使命担当，还有女性特有的韧性，我相信这一切都能够迸发出强大的力量，使我成为一名称职的副会长。



黄远兵（副会长）

本人参选副会长的优势如下：

第一，我有比较丰富的律协工作经验。我参加律协工作近十年，从委员到副主任再到理事，一步一个脚印，维权委、参政委以及区律工委的工作让我在多方面都得到锻炼，亲力亲为加上耳濡目染，让我对律协工作的了解有一定的广度、深度和高度。

第二，我有比较丰富的律所管理经验。我长期在律所担任主任，律所经历了从十几人的小所到两三百人规模大所的发展历程，平时对于行业发展的热点和趋势很感兴趣，日积月累，我积累了一些律所管理的经验和对行业发展的思考。我若当选副会长，一定协同会长班子结合自身经验，制定出更符合深圳律师行业特点的发展战略。比如我们能否打造一个全市范围的法律服务供需合作平台？我们能否推动设立法律服务业发展基金？我们能否创设一个深圳自己的法律服务高端论坛品牌？我们能否做一套律所的合规体系，帮助律所，尤其是中小律所完善自我，规避风险？希望日后，让我将上面的思考逐步变为现实。

第三，我有较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规则意识。我认为律协的工作不应讲求个人英雄主义，应该倡导协同作战，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团结、奉献、包容，是我一直倡导并且遵守的合伙人精神。我认为，尊重规则是一名法律人的底线，对内不折腾，对外一盘棋，我相信这种品质能让我做好一名副会长。我若当选，必将秉承“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精神，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拼尽全力，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一定有我。



任杰（理事）

我曾担任十届律协理事，圆满兑现了竞选承诺。我组建了深圳律师艺术团，多次参与国内外演出和比赛，以良好的口碑提升了深圳律师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参与打造歌曲《我们深圳律师》，该歌曲可在各大音乐网站、KTV 平台点播，获得司法部好评，展现了深圳律师披荆斩棘、奋勇向前的精神；我导演了市律协成立 30 周年庆典晚会，历时三月余，终在市民中心礼堂隆重举行。请再给我一次服务深圳律师的机会，我将全力以赴、全心全意，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



李军强（理事）

在十届律协工作中，我始终践行“专业为立业之本”的理念，系统谋划，有序推进。通过举办业务创新大赛等途径，拓展律师业务范围，规范专业服务，着力提高深圳律师整体专业服务水平。在自身专业发展上，我将环保法律服务作为终身事业，全力专注开拓 12 年，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诱惑，我都坚守如初、无怨无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愿意继续发扬“认真、投入、开拓”的老黄牛精神，与各位同仁一道为深圳律师业和深圳法治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辛先霞（理事）

昨天，我是刚毕业的河北邯郸姑娘，拖着皮箱独闯深圳，求索的路上有汗水、泪水。今天，我专注慈善法务，不忘初心，获得司法部颁发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律师的“双国优”，实现专业至上的追求。明天，我想推动行业发展，我有以下优势：一是执着，认准的事情必全力以赴，出手必出彩；二是有管理经验，深知律协发展情况，任省律协理事五年间多次获得优秀委员的表彰；三是重承诺，我决不做举手手的理事，我要做敢当有作为的理事。



孙春桥（理事）

本人作为深圳律师篮球队队长，一直在文体战线为大家提升幸福指数。2018 年我们发起福田区首届律政迎春杯篮球赛，加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2018、2019 年连续举办了两届深圳市律师运动会，2000 多名律师参与赛事，并在运动会中首设女子篮球比赛；还组织深圳律师足球队前往西班牙参加律师世界杯。通过体育运动充分展现了深圳律师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时光飞逝，那些日子仿佛就在昨日，我愿意继续为行业发展、为广大律师健康事业努力奋斗！



刘国江（理事）

从事律师工作以来，我一直积极参加市律协组织的各项活动。曾作为球队代表获得过广东省律师足球超级联赛亚军，近三年来，荣获律协“优秀委员”、市律师行业“积极支持党建工作合伙人”、光明区“十佳律师”称号，以上说明了我的工作能力。此外，我常年热心于公益活动，在加入慈善公益组织的 12 年里，我在助学、助残、慈善拍卖、防控疫情等各方面做到出钱出力，还出心出血。如果我当选，我愿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广大律师，为创造更好的执业环境办实事。



李鲲（理事）

从办理第一宗律师维权案件至今，我深感深圳律师执业的艰辛与维权工作的不易。四年多来，我参与办理维权案件 200 余宗，从营救开庭后遭绑架的律师，再到千里之外解救被抓的深圳律师，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其中一宗案件获评全国律协“十大典型维权案例”。过去四年，我们修规则、建制度，从单兵作战发展至全国联络维权新格局，工作成效在全省乃至全国处于领先。我参与起草的《深圳市关于进一步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益实施办法》历时三年，近百次沟通打磨，在 2020 年 8 月发布，赢得好评。如果我当选，我将继续为全市律师维权。



任松岭（理事）

我来自广和所，从事律师职业 16 年，目前是广和所管委会成员。在十届律协担任申执委副主任，负责实习律师培训和课程安排。为了实现梦想，2013-2014 年，在攻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学位期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交流学习。我以深圳律师为荣，努力传播和颂扬深圳律师创新、严谨、求实的行业精神。工作中，我认真负责，乐于分享；生活中，我简单朴实、与人为善，希望有机会继续为行业做贡献。



梁华（理事）

我万分感恩深圳这片热土，是深圳律师行业成就了我。我希望把过去 20 余年的成长经历奉献给它。我有三点优势：一是有行业服务经验，曾任两届房地产与建筑工程委员会副主任，现任律师行业团委书记；二是有律所管理经验，执业 21 年，负责律所管理事务，律所规模和创收均快速增长，获评亚洲法律杂志（Asian Legal Business）“中国十家成长律所”称号；三是有丰富的团队业务经验，2014 年资产证券化新规出台，我带领团队承办的法律服务产品连续三年行业排名靠前。



潘翔（理事）

今天，我兑现了四年前竞选理事时的承诺，带领十届律协会会员委完成了 17 项工作计划，经监事会考核评为优秀。过去四年，我们推动通过了对老年律师、分娩女律师、青年律师减收会费的制度；建立了深圳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信访制度；担任组长，制定了政府法律顾问全覆盖 1+3 规范性文件；促使出台了《深圳市关于进一步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实施办法》等工作。今年，我获得律协重大专项工作突出贡献奖，真心实意为行业做实事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



孙程旭（理事）

我曾担任十届公益委主任，每年投入公益法律服务不少于 500 个小时，这项工作让我感到快乐且有意义。我们成立了手语法律服务团、深圳市青年律师法律服务志愿团等，推动了深圳“1+1”法律援助志愿行动的发展，有 26 名深圳律师奔赴祖国贫困地区做法援，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面对疫情严峻考验，我们联合多家慈善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公益法律的发展才刚刚开始，助力深圳律师、深圳律所公益活动的理念尚未完全实现，这是我站在这里继续参加竞选的原因。



杜芹（理事）

我是一个热情、努力、真诚的人，曾做过律协两届委员、一届主任。我的业务专长是家事领域，办过的很多案例是业界首例，出版了四部专业书籍，组建并管理着稳定和团队。很多律协工作可以用家族财富管理传承中“守攻传”的方法来理解，“守”即守住行业底线，“攻”就是创新发展，推动律师行业稳步向前；“传”是将法治精神传承下去。未来的路充满挑战，我相信我可以将普通的事情做出不普通的效果，因为我有一颗真诚为大家服务的心。



赵广群（理事）

我曾任律协维权委副主任，经常冲在律师维权第一线，多次奔赴外地为律师讨公道，我感到荣幸和自豪。作为六届、七届市人大代表，我始终坚持为律师执业环境的改善、律师行业的发展建言献策，共提交相关人大建议案、立法议案 20 余件。去年和今年我连续提交人大建议案，推动实现深圳律师在家门口查询全国人口信息，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我愿继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为行业发声，为广大律师服务。



温贵和（理事）

律师职业的责任、使命和梦想让我义无反顾投身于这份工作。在所里我先后担任书记、主任职务，积极探索业务、所务和党务的融合创新发展，2020 年被深圳市人社局评为创新人才。这些年，我一直投身于行业工作。2009 年成功推动法治日报社与市律协的合作，助推《深圳律师》杂志走向专业道路；曾是十届律协前海委委员，协助委员会多次出版研究成果；2020 年，我发起成立前海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任监事长，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如果当选，我将保障充足的时间投入工作，并将开放全部自身资源服务行业。



楼洪（理事）

我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法学博士，是深圳市“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现任星辰所党总支副书记和管委会成员。我曾任十届律协国际委和涉外委委员，被评为优秀委员。这几年来，我八次站在协会的各种台上，包括培训、讲座、国际会议。只要协会需要我，我一定冲锋在前。如果当选，我的工作重心一在涉外法律业务，二在青年律师工作，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活动、更多的平台、更多的展现舞台给到我们深圳律师，使我们涉外业务可以跟北京、上海的同行一比高下，使我们的青年律师成长壮大。



王寿群（理事）

我将以两个“精神”，竞选一个为深圳律师服务的机会。一是创新精神。我执业 20 余年，创办中国第一家粤港澳联营律师所、中国第一个创客法律服务中心、中国第一家生物医药产业法律研究院。在前海创业 7 年间，我们四度获得“十大法治事件”，两个项目获得“改革开放 40 年广东律师行业走在前列的 40 个事件”。二是服务精神。我先后担任律协金融委主任、涉外委副主任，参与创立了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并任秘书长，有丰富的协会工作经验。“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我愿继续发挥我的两个精神为大家谋取更多的发展机遇。



乔瑞（理事）

于协会而言，我是新面孔，我想大家也想在协会工作中看到新的变化。我执业以来一直在康达深圳分所，经过近 20 年的积累，我也慢慢走向管理岗位，开始寻求律所现代化和职业化的新发展，因此我特别关注行业的发展动态，不放过每一次行业交流的机会，甚至远赴重洋求经问道。在此期间，我亲手打造了一体化的律师团队，作为所内试点，效果良好。承担这些工作，促使我不断思考我们行业该如何发展，希望我的思考和经验教训能够在协会工作中起到促进作用。



许宜群（理事）

深圳是现代化都市，营商环境是第一，法治环境在全国并不是第一，我们要为法治深圳、健康深圳，为深圳的近2万名律师加油喝彩。我从业以来，每年用几十万条的短信进行普法。在政协期间提了将近50件提案，其中20件关于律师工作，涉及律师的周末会见、查询、通道窗口，我愿意给大家做贡献。如果我能当选，我将赞助价值214万的财产、服务或者现金用于法治和健康事业，实现自己崇高的梦想和愿望。



马卓檀（理事）

我曾任十届律协理事，担任文表委主任，和深圳的律所、深圳律师有过很多沟通交流。其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难”，大所喊难，综合所喊难，做专业的律师喊难，执业时间长的律师也喊难。在中小所传统律师身上，我看到更多的“难”。四年前我参加竞选时，我所在的资本市场业务领域里，当时的环境是大家分散作战，收费较低。我率先提出收费办法，要求按照市场平均值作为我们和客户商谈的起点。经过几年的尝试，现在大家基本认可我这种收费模式，从而带动大家的平均收费水平，相较几年前来说提升70%。



潘春明（理事）

因为足球，我两手臂先后粉碎性骨折，至今仍靠四块钢板固定，人称“钢铁战士”。我积极投身律协各项工作。2017年，我作为理事带领全国首支以行业为组织的深圳律师足球俱乐部出征越南，抗日破韩，夺得第三届律师亚洲杯季军；也曾带队到西班牙、泰国参加律师世界杯、亚洲杯；作为惩戒委委员参与审理案件几十宗，最大限度保护同行；我还是罗湖区工委的一员，在各项事务中尽职尽责。我认识到协会工作和足球有很多共通之处，首先是严守规则，其次是团结，最后是坚持，不畏险阻，只要坚持就会取得胜利。



程建锋（理事）

秉承“有限管理，无限服务”的理念，我将用我的真心、耐心、同理心，为大家做好服务。第一，全力配合会长团队的工作，探索创新，为大家营造良好的执业环境；第二，注重倾听律师的意见，本着共建、共享、普惠、均等的理念，提高广大律师的归属感和幸福感；第三，加强青年律师、专业律师的培养，引领律师走专业化道路；第四，加强大所与小所的交流，取长补短，促进律师业均衡发展；第五，关注老律师和女律师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宽松的执业环境；第六，推动律师收费标准的改革和律师税务成本的减少，增加律师的收入。



黄庆礼（理事）

做理事不是做官，是来做奉献、做实事的。过去四年我担任青工委副主任，也是南山区工委委员兼主任助理，在这两个岗位上学习了很多，成长了不少，对于服务行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履职的经验。有机会的话，下一个四年，我特别想推动两件事：一是推动律师作为新人结婚宣誓的见证人，不仅庄严神圣，也希望能成为深圳一个潮流；二是推动深圳法律服务公司聘请深圳律师做法律顾问，合规经营。



孟荻（理事）

我曾任第十届律协前海委主任、福田区工委副主任，回顾四年工作，我以责任、感谢和两个标点符号总结。就责任而言，上一届理事工作，我做到理事会会议31次全勤，也兑现了竞选承诺，带领前海委编撰《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律体系构建》一书，成立粤港澳大湾区讲师团并开展工作。就感谢而言，感谢市司法局、福田区司法局、上一届理事会及各位律师对我的支持。就两个标点符号而言，上一届理事工作已画上圆满句号，本届是省略号。我做事热血澎湃，充满干劲，我将尽我所能使律协成为律师的精神家园、成长沃土、心灵港湾。



高文杰（理事）

我是十届律协理事，也是司法部千名涉外律师人才。过去四年我担任国际委主任，我们着力于厚基础、壮队伍，组织开展了首次深圳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培训，赴美取经，并在境内举办数十场讲座，大力培养涉外人才；推动协会与1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合作关系，扩大了影响力，工作用心用情。我认为下一届理事会的工作重点起码包括：一是做大做强，提升我们的整体竞争力；二是补齐短板，提升我们的专业竞争力；三是统筹规划，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若当选，我承诺使全市入选全国、省、市涉外律师领军人才的数量翻番，引领湾区。



彭学武（理事）

我执业20年，明白我们律师需要什么样的理事，理事应当做什么。多年丰富的仲裁员办案经历使我尊重律师，养成善于倾听、谨言慎行的习惯，大大提高了我处理问题的能力。我认为我已具备为深圳律师做贡献、做实事的条件和能力，我愿为此付出。如果我当选，我定耐心倾听律师的心声，重视各位代表的意见建议，尊重每一位律师，认真履职，主动接受各位律师的监督，为深圳律师办实实在在的好事。至于办什么样的好事，我想应当紧紧围绕我们律师所需所想，且为理事力所能及的事，而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主观臆断。



李凯（理事）

我的竞选优势有四点：一是政治立场坚定，思想觉悟高，带领所在党支部先后获市律师行业党委、省律师行业党委评为优秀党组织，本人也获得优秀党员的荣誉。二是法律服务21年，执业16年，对律师行业特别是深圳律师行业的特点、优势和不足有充分的认识 and 了解。三是多年担任大型律所党支部书记和管理合伙人职务，具备比较丰富的律所管理经验。四是本人性格开朗，乐于奉献，敢于担当。如当选，我将在律协和党委的领导着着眼大局，尽心尽力履职。



周敏*（理事）

我在深圳、上海、成都生活工作过，有较为丰富的生活阅历，适应新环境、接受新挑战的能力强。2013年，又回到深圳定居，女儿转学即小升初，我想全职陪着。但我的老师鼓励我不要为家庭而放弃工作，应当有更多的社会价值。2014年，新雨计划的负责人跟我说：每个人都是有使命的，做律师公益就是她的生命责任。后来，我成为“新雨计划”的首批志愿律师。良师益友的鼓励和鞭策，促使我不断思考人的社会价值与生命责任。我一边思考，我一路前行。今年，我女儿已在英国读大二。今天，我参加竞选，期待新的开始，追寻新的价值。

*因理事周璇当选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为了更好履职，周璇理事主动申请辞去市律协第十一届理事一职，按照《章程》规定，根据大会理事投票结果顺位增补周敏为新一任理事。

深圳市律师协会第七届监事会 工作团队竞选演说摘要

（根据大会现场录音整理）



曾常青（监事长）

曾几何时我的一位湖南老乡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那气定山河惊天动地的气势，于我是感召，是指引，更是力量。我是当兵出身，来自老百姓，我认为监事长更需要兵的力量和气派！如《亮剑》中所言，即使倒下，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我虽不是上一届监事，但我在律协担任过两个委员会（南山区律工委、公司法专业委）的一把手，还是省律协监事长（吴波）的亲密战友，受她影响，我对监事会的程序了然于心，对干好深圳律协监事会，心中早有一盘棋。

我首先向大家表明我的监督理念。深圳律协从强势监督到和谐监督，理性监督到智慧监督，汇集了历届监事会的智慧。我要守正创新，用70后的担当，针对协会现状和理事会的风格形成新的监督特色。我要将监事会和行业党委、纪委等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形成合力，开展合力监督。监督不是找事、惹事、挑事，我们不仅要监事，还要帮事，要合力监督促成理事会工作落成。我既要监督乱作为，也要监督不作为；我既要反对乱花钱的败家子，也要防止守财奴似的铁公鸡。我必须办好以下七件事：

一是监督协助带领律师行业开展管理创新、业务创新。身处创新之都的深圳律协，拿什么和“双区”驱动

匹配？我在科技创新高地的粤海街道办潜伏三年，作为该街道的法律顾问，我头脑中时刻想着创新。

二是要跳出事务性监督的局限性，重点监督律师维权，关心律师疾苦。我要在任期内加上所有律师代表的微信，走访所有代表的律所，一个不落，广泛听取意见，把你们的意见办好。

三是要敦促案件通过快查快审尽快结案。我现在仍是律师行业纪委委员，对当事人恶意投诉的案件深恶痛绝。

四是监事会要在各区设立工作联络站，让协会的监督工作延伸到基层，让广大律师能看得见、找得到、监得准。

五是我要从我自己监起，今后监事会每个月公布监督工作日程表，与理事会建立互评机制。

六是我要组织律师界10名政协委员，以及包括我在内的10名人大代表和10名在座的律师代表形成合力，开展合力监督。如果涉及律师行业一些重大维权案件，发现理事会力度不够，将开展强势维权。

七是前面三位监事长都连任两届，我承诺我只做一届，不连任，断绝做老好人的后路。



刘鸿（副监事长）

我深知，当选监事不仅是荣誉，更是责任和担当，肩负着代表们沉甸甸的信任，承载着18000多名律师殷切的期待与希望。我竞选副监事长，因为我拥有四年多的监事会工作经验，熟悉监事会运作规程，明确监事会职责和使命。我热爱律师职业，愿意为我们行业规范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以创新的工作理念，推动协会理事会、秘书处更加合规有效运作，切实提高深圳律师行业的社会地位，让广大律师真切感受到社会对我们律师职业的尊重。

如果我当选，我将与新一届监事会全体同仁一道，守正出奇，凝心聚力，充分发挥监事会应有的作用，让监事会成为协会开展各项工作有力的助推器；如果我当选，我一定会推动把维护深圳律师执业权益作为本届监事会的工作重点，让每一位律师都能体面、公平、有尊严地执业。我将充分发挥过去四年多积累的监事工作经验和优势，认真履行协会章程赋予的权利和职能，推动制定切实有效的新一届监事会工作规划，传承并完善原有的工作制度，建立周密有效的监督执行机制，对协会作出的涉及律师权益的各项决策进行充分论证，对有利于提升律师权益的各项措施，坚决支持；对有损律师合法权益的做法及不认真履职的监督对象，敢于亮剑，绝不容忍。



吴小波（副监事长）

日前有幸作为深圳8名代表之一，亲临全国律师代表大会现场，见证全国律协成立监事会。我结合全国律师代表大会的精神和我四年履职的心得，谈谈作为副监事长应该做到以下“三要”和“三不要”：

第一，要讲团结，顾大局；不要搞小团体，图私利。作为副监事长，首先应当在监事长领导下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协助其他监事开展监督工作。作为留任的两名监事之一，有责任、有义务把往届监事会积累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更应该在工作中及时补位，共同把监事会的工作做好，一定不搞小团体，更不能贪图私利，利用副监事长的身份为自己和自己的律所谋求私利。

第二，要举旗亮剑，监督到位；不要回避责任，监督越位。监事会的监督必须到位，确保每一项活动都符合协会章程和相关规定。要站在行业整体发展的角度促进相关工作的推进，对律师代表和广大律师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不回避监督责任，勇于发声，以监督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监督不错位、不越位。

第三，要谋全局，重实效；不要以偏概全，流于形式。加强应用新工具、新思维，在标准化和精细化方面多做探索，不断追求监督工作的有效性。要监出实效、监出高潮，还得“老监”来。要成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为协会多做贡献；让占位置、不干事的人现出原形，坚决杜绝监督工作流于形式。



李继承（监事）

自 2008 年加入第六届律协开始，我在深圳律协服务了五届共 13 年。曾任律协专门委的维权委、纪律委、调查委以及专业委的民委、刑委、公司委等委员，还任上一届宝安区律工委主任，多年的历练，让我积累了丰富的协会工作经验，也让我对协会的工作规则和工作纪律有深刻的认识。我认为一名优秀的律协志愿服务者一定是热爱律协、长期担当、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者，我热爱律协工作也富有公益情怀。我认为监事就要像一个闪亮的大灯泡，让律协的每一项工作都接受律师代表的监督。如果当选，我一定做到内行监督、精准监督、有效监督。



李斌泉（监事）

我在上届律协中担任刑诉委委员兼秘书长，配合委员会主任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成功邀请业内大咖来深举办专题研讨会，为深圳律师提供了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本人的工作也得到律协的认可，三次被评为优秀委员。此外，我还担任了三家商会的法律顾问以及深圳市湛江商会监事长，熟悉商协会工作流程和监事工作。我是 20 年党龄的律师，执业 12 年，从未受到当事人的投诉。我希望有机会继续为深圳律师服务，如果当选，我将严格按照协会章程的规定，坚守原则、恪尽职守，切实履行监事的职责。



邹红芳（监事）

作为一名女性律师，虽然果敢和强硬不是我的特长，但我自有内心的那份坚韧。若有幸当选，我将服务为本，勤勉尽责，做到四方面的坚决支持、四方面的坚决监督。为树立深圳律师形象的坚决支持，为专业匠心精神培养的坚决支持，对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身心健康的坚决支持，对新经济、新领域的律师服务持开放和审慎包容的态度坚决支持；对动摇法律信仰、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坚决监督，对违反纪律红线、法律底线的坚决监督，对挑战职业道德、职业操守的坚决监督，对出于私利打个人算盘的坚决监督。同时我将密切联系广大律师听取意见，积极建言献策。



邹俊亮（监事）

协会监事会监督对象包括会长、理事、秘书长等，是艰巨的、辛苦的、得罪人的工作，需要大量时间，还需要做到坚持原则、廉洁自律。我有决心、有精力、有信心做好监事。我今年 37 岁，可以说是正当时，有十几年执业经验，跑过马拉松、越野赛，精力、脑力、体力充沛，还富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宋校红（监事）

我热爱律师职业，它给了我竞争的舞台，我的妻子也是律师，我的热爱是真诚的，没有任何虚假。我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自 1997 年从事律师职业至今 24 年，当过 16 年的合伙人，10 年的律所主任，当过一届深圳仲裁委仲裁员、一届民委副主任，曾获得协会优秀专业委委员。我有公益追求，做了 20 多年律师，不能仅仅埋头做案件，也要做公益，回报行业。竞选监事不仅仅是荣誉，更是责任，如果我当选，我将严格履行职责，勇于监督，不辜负代表的厚爱。



林志平（监事）

我具备竞选监事的条件。虽然我是 80 后，但我是服务律协的老兵。我曾任八届律协公益委委员、九届律协青工委委员、十届律协战略委委员和民委委员，在律协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上，有幸被评为优秀青年律师；同时，我还是律所里的高级合伙人和党支部书记，有丰富的服务和管理律师、律所的经验。如果我当选，我将勤勉履职，做到坚持原则、办事公道、热心公益，具体问题多协商，争议问题求同存异。



卓圣国（监事）

对于协会工作来说，我是个新人，但我相信我可以胜任。我的名字里“卓”是正直卓越的意思，“圣”就像监事工作一样神圣，“国”象征着宝贵的玉石需要相关部门的监督及呵护。我出生在汕头的农村家庭，经过努力考上西南政法大学取得硕士学位，2008 年毕业后来到深圳，也是两手空空，与深圳精神一样，我具备敢闯敢拼的精神，后来下定决心走自己办所的道路。我将多维度地思考和开展监事工作，请大家圆我圣国梦，明天我们一起实现中国梦。



赖智欣（监事）

这是我执业十几年来第一次参加竞选活动，相对于很多老面孔，我算是新鲜出炉的“老腊肉”，但作为新面孔，我少了一份圆滑，多了一份无畏，反正我跟谁都不熟，也无需照顾谁的面子。上到会长，下到实习律师，我通通敢监督，监事就必须敢监。如果我当选，我的工作准则是谁触碰了行业的底线，谁侵害了律师的权益，谁不能兑现自己竞选时的承诺，不管他的脸有多大，我必定跟他翻脸，一定不会只放空炮。

读懂综合保税区与自贸试验区

为大湾区涉外法律服务 贡献海关法律智慧

○封海滨* 上海兰迪（深圳）律师事务所

综合保税区是目前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主要形态和未来的单一形态。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时期打造对外开放高地的新起点。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省“十四五”规划带动全省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主平台^①。

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提质增效，是建设贸易强省，促进外贸发展的重要环节。与此对应，大湾区涉外法律服务，特别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法律服务，离不开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法律制度的把握和应用。本文对海关特殊监管区 / 综合保税区与自贸试验区、自贸区的区别与联系作整理和介绍，以期为“十四五”规划下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法律服务，提供海关法律方面的提示与参考。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与综合保税区

（一）海关特殊监管区的由来

海关特殊监管区是为了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要求设立并实施特殊进出口监管政策的区域，由海关实施监管，与境内其它区域之间，设立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隔离设施。海关特殊监管区制度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不同名称，如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

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不同名称，在政策和功能上，既有重叠，又有区别。仅从名称上看，有的非常相似，例如“保税区”和“保税港区”，仅有一字之差，但具体监管内容上，往往区别很大。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整合

从2012年起，针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存在命名不统一，功能重合，政策重叠等问题，国务院开始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整合。这个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对应国务院出台的两个意见。

1. 引导统一命名。2012年10月27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科学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58号）指出，国务院先后批准设立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等6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存在种类过多、功能单一、重申请设立轻建设发展等问题，要稳步推进整合工作。逐步将现有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及符合条件的保税区整合为综合保税区。新设立的特殊监管区域，原则上统一命名为“综合保税区”。

2. 刚性统一命名。2015年8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方案的

通知》（国办发〔2015〕66号）印发。《通知》要求，逐步将现有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及符合条件的保税区整合为综合保税区。新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统一命名为综合保税区。此后，新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从“原则上统一命名”的引导性要求，转变为强制性要求“统一命名”，并且在整合功能、整合政策、整合管理方面，作了具体要求。

（三）综合保税区的“双高”开放和发展要求

2019年1月12日，《国务院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9〕3号）印发。《意见》对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高质量（“双高”）开放和发展提出了要求。

首次对综合保税区作了“五个中心”的权威定位。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综合保税区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销售服务中心。

明确海关总署的牵头地位。要继续做好牵头工作，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发挥东部地区创新引领作用，促进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提高开放水平。

再次强调整合提升。要继续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提升，推动符合条件的各类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优化为综合保税区。

明确综合保税区的先头地位。承接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提出要支持综合保税区制度创新，率先全面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相关改革试点经验。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与综合保税区

（一）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

作为我国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起点，以2013年9月18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发布为标志，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引擎。此后，全国陆续批准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

我国的自贸试验区，与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园区（Free Trade Zone, FTZ）概念一致，按照《关于简化和协调海关制度国际公约》（《京都公约》）定义，是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种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

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措施”。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战略任务^②。目标是通过大力简政放权和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探索新路子。通过在局部地区率先扩大开放，为全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压力测试，积累经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造动力更强、结构更优、质量更好的经济增长极，为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面向世界，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和通行做法，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新理念、新体制，为我国双边、区域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积累经验，为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奠定坚实基础。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在自贸试验区内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成果，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2015年4月8日，《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印发，广东与福建、天津作为第二批成立自贸试验区的省份，进入自贸试验区“俱乐部”。根据国务院部署，广东自贸试验区突出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

（二）海关法律体系下综合保税区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关系

当我们步入广东自贸区的某一个片区，会有明显的标识。但是，除此之外，与正常的城市空间并无不同，没有围墙、围网等物理隔离设施。自由贸易试验区虽然也是实行特殊监管制度的区域，但是，与自贸试验区内的综合保税区相比，并不是一回事。

就二者关系而言，自贸试验区一定包括海关特殊监管区，以综合保税区为主。自贸试验区的地域空间范围，大于综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不设卡口和围网，自贸试验区内的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必须以作为海关特殊监管区（以综合保税区为主）为载体，实施“境内关外”（国境内关境外）的特殊进出口监管制度。自贸试验区全域绝大部分仍为“关内”（国境关境内）。

以广东自贸试验区为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

* 封海滨，广东省涉外律师领军人才，深圳市首批涉外律师领军人才，深圳市律师协会大湾区讲师团成员。

①详见2021年1月26日广东省人大审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②详见《国务院关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2015年4月22日汪洋副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试验区包括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蛇口、珠海横琴新区三个片区。按海关监管方式划分，广州南沙新区片区和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内的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重点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广州南沙保税港区和深圳前海湾保税港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试点以货物贸易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主要开展国际贸易和保税服务等业务；珠海横琴新区片区试点有关货物贸易便利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创新^③。

可见，自贸试验区的地域范围内，包括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与非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而自贸试验区中实施的制度创新，特别是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服务制度创新，必须以具有物理隔离设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为载体，在海关特殊监管区范围内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进出口贸易自由流通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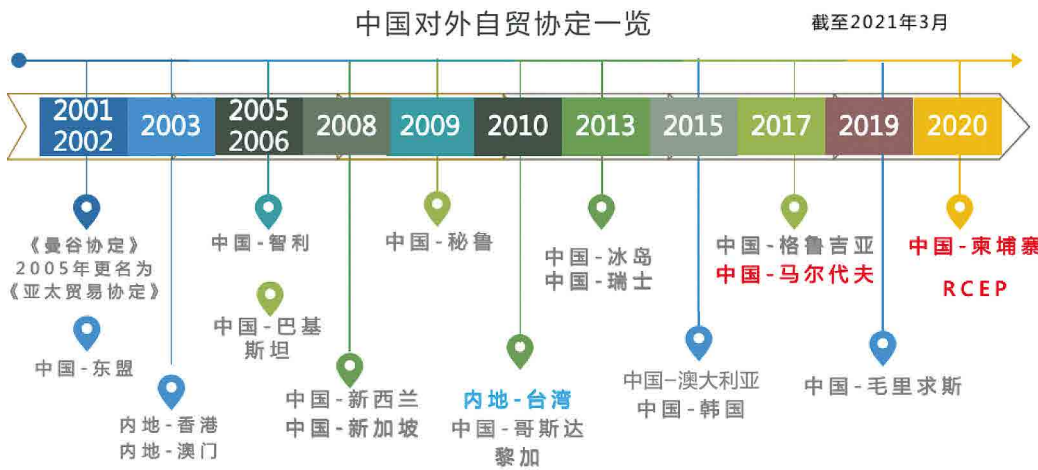
（三）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区

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近的另一个概念“自由

贸易区”，非常容易混淆。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是指双边或多边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形成的以最终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目标的特定区域。2020 年 11 月 15 日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我国最新加入的自由贸易协定，涵盖了 22 亿人口（占全球将近 30%）的市场、26.2 万亿美元 GDP（占全球约 30%）和将近 28% 的全球贸易（基于 2019 年数据），生效后将形成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 2021 年 3 月 10 日，我国签订或加入的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或贸易安排，数量为 19 个。

而自由贸易园区 / 试验区，指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境内设立的实行优惠税收和特殊监管政策的小块特定区域，即前文述及《京都公约》所定义的 FTZ，与我国目前设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基本一致。二者的联系和区别如下表：



		自由贸易区（FTA）	自由贸易园区（FTZ）
区 别	设立主体	多个主权国家（或地区）	单个主权国家（或地区）
	区域范围	两个或多个关税地区	主权范围内小块特定区域
	法律依据	双边或多边协议	国内立法
联 系		国务院：建设自贸试验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面向世界，对标国际经贸规则和通行做法，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新理念、新体制，为我国双边、区域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积累经验，为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奠定坚实基础。	

③详见《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发〔2015〕18号）。

三、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好融入全球市场体系。依托粤港澳良好合作基础，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重大合作平台作用，为粤港澳发展提供新动能，为内地与港澳更紧密合作提供示范。《纲要》专设篇幅对优化提升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功能、打造广州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推进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进行了部署。

对比《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与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在三大片区的制度创新、监管优化上，实现了聚焦融合。《方案》确定的自贸试验区实施范围涵盖三个片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珠海横琴新区片区。三个片区确定了各自的发展重点，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广州南沙和深圳前海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试点以货物贸易便利化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开展国际贸易和保税服务等业务；珠海横琴新区片区试点有关货物贸易便利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在三个片区的发展和布局上，与《纲要》完全融合一致。

基于大湾区的独特优势，广东省“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双区引领”的总体要求，提出紧抓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重大机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平台，引领带动全省形成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更高水平参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打造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为广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更有有力支撑。

在“十四五”规划的加持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合广东自贸试验区建设，以海关特殊监管区的整合与融合为抓手，对外贸易便利化，营商环境优化，必将再次驶上快车道。

四、海关法律在大湾区涉外法律服务中的作用

综合国务院和海关总署发布的文件、公告，海关特殊监管区，由国务院批准的共有 6 类：保税区、出

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跨境工业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随着形势的发展，综合保税区成为政策引导、明确的主流形态，并且将是海关特殊监管区未来统一整合后的单一形态。

根据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共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160 个。其中，保税港区 2 个，综合保税区 147 个，保税区 9 个，出口加工区 1 个，珠澳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1 个。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规划面积超 445 平方公里^④。

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地海关特殊监管区，共 16 个，具体如下表：

广州	广州南沙综合保税区	东莞	东莞虎门港综合保税区
	广州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	珠海	珠海保税区
	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		珠海跨境工业区珠海园区
	广州保税区		珠海高栏港综合保税区
深圳	广东广州出口加工区	汕头	汕头综合保税区
	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	梅州	梅州综合保税区
	深圳盐田综合保税区	湛江	湛江综合保税区
	福田保税区		
	深圳坪山综合保税区		

在上述海关特殊监管区中，又有部分属于中国（广东）自贸试验区的实施范围。

总结海关特殊监管区、综合保税区、自贸试验区、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内容，可以发现，这些概念和相应的制度，都与一个法律渊源有关，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海关特殊监管区、综合保税区的直接法律渊源是海关法律；自贸试验区、自贸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在贸易监管制度创新这个层面上，离不开海关法律。

作为大湾区涉外法律服务的一部分，无论是经营主体层面上对外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准入评估、营商保障、争议解决，还是监管主体层面上相关制度创新的法律论证和评估，都必须对相应的海关法律制度有全面、准确的把握和应用。

海关法律服务领域的法律人才和服务机构，也需要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监管制度现状和发展的创新研究，从理论和实务上，更好、更有效地为大湾区涉外贸易法律服务贡献出海关法律的智慧。

④海关总署网站 <http://zms.customs.gov.cn/zms/hgtsjgqy0/hgtsjgqyndqk/3500869/index.html>，最后访问日期 2021 年 5 月 8 日。

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的法律研究

○谢烨蔓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性质决定了其不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标，同时还需要兼顾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在 2016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国企改革应始终坚持政治逻辑和经济逻辑齐头并进、相互成就。而实现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协调融合的一项重要抓手，即党组织参与到国企公司治理当中，这使得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呈现出特殊性。围绕该主题，本文将区分不同类型国有企业，从党组织参与的政策法规基础、党组织参与的途径以及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三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的政策法规基础

《宪法》通过根本大法的形式，奠定了党对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领导地位。《公司法》通过第十九条的规定，为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支撑。《中国共产党章程》虽然不是法律文件，但因为《公司法》第十九条的指引，成为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的具体行动方针。相继出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党组织参与的途径、方式和要求，为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提供了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相关政策法规汇总如下：

文件名称	规范内容	相关条文	适用范围
法律			
《宪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第一条	所有国企
《公司法》	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十九条	所有国企
党章			
《中国共产党章程》	1. 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 2. 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开展工作。	第三十三条	所有国企
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	1. “三重一大”事项主要包括重大决策事项、重要人事任免事项、重大项目安排事项、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 2. “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的基本程序：党委（党组）前置。	第二条 第三条	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含国有和国有控股金融机构）
《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1.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在企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2. 加大工作力度，努力实现职工 50 人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有党员。有 3 名以上正式党员、条件成熟的，要单独建立党组织。暂不具备单独组建条件的，要以开发区（园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单位，组建区域性党组织，或依托行业协会（商会）、个体私营企业协会和龙头企业、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组建行业性党组织。 3. 建立双向互动工作机制。按照企业需要、党员欢迎、职工赞成的原则，注意取得非公有制企业出资人理解和支持，把党组织活动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目标同向、互促共进。	第一条 第三条 第四条	非公有制企业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1. 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 2. 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3.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	第（九）款 第（二十四）款	所有国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	1. 健全以公司章程为核心的企业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企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2. 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 3. 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保证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4.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人权相结合。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	第一条第（二）款 第二条第（五）款	国有独资、全资和控股企业
《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	1. 着力抓好国有独资、全资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章程。 2. 稳步推进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章程修改工作。要注意听取其他股东包括机构投资者的意见。	第一条 第二条	国有独资、全资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国有资本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	1. 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 2. 国有企业党支部（党总支）以及内设机构中设立的党委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3. 国有企业应当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写明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基础保障等重要事项，明确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4.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 5. 国有企业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党组）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	适用于国有独资、全资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并具有实际控制力的企业参照执行

《广东省省属企业公司章程指引(国有独资公司篇)》	1. 公司党委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公司重大事项。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委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者经理层作出决定。 2. 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符合条件的党委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党员总经理担任副书记。党委可以配备专责抓党建工作的专职副书记，专职副书记一般进入董事会且不在经理层任职。	第四章	广东省省属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	1. 本办法规范的是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 2. 国有企业公司章程一般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一）总则；（二）经营宗旨、范围和期限；（三）出资人机构或股东、股东会（包括股东大会，下同）；（四）公司党组织；（五）董事会；（六）经理层；（七）监事会（监事）；（八）职工民主管理与劳动人事制度；（九）财务、会计、审计与法律顾问制度；（十）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十一）附则。 3. 党组织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 4. 党组织主要职责在于“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第二条 第二章	适用于国家出资并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监管的国有独资公司、国有全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党建工作参照第九条把党建工作基本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国有企业出资企业可以参照本办法

从上述政策法规可以看出，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国有企业，均应坚持党的领导，国有资本流动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组织的作用就发挥到哪里。但应当区分不同的国企类型，适用不同的政策法规，采取不同的党建模式。其中，国有独资、全资和绝对控股公司应主要适用《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和《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国有相对控股公司结合实际参照适用前述规定；国有参股公司应主要适用《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二、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的途径

（一）国有独资、全资和绝对控股公司

党组织参与国企治理从未在国企改革中缺位，但是其地位、参与途径和工作重心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形势、大政方针、实际需求的变化动态演进。现阶段，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

1.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是指符合条件的党委（党组）班子成员可以通过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党委（党组）；党委（党组）书记、董事长一般由一人担任，党员总经理担任副书记；进入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必须落实党组织决定。

这一制度安排最早出现于1997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则是在201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中。其后出台的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和2020年《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等文件继续坚持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但目前的政策法规尚未对“双向进入”的比例作出明确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

2. 三重一大、讨论前置

党的十九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将国有企业党委和党组的职能合并表述为“发挥领导作用”，以党的根本大法形式确定了党组织的新职能。与过去的“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相比，“发挥领导作用”内涵更加丰富，对公司治理的参与更加深入。具体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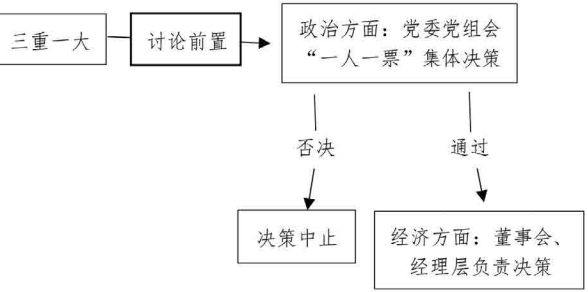
言，即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对“三重一大”事项，应先由党组织进行研究讨论，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进行决策。“三重一大”事项主要包括：

事项	含义	主要内容
重大决策	依照《公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企业国有资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规定的应当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未设董事会的经理班子、职工代表大会和党委（党组）决定的事项。	企业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上级重要决定的重大措施，企业发展战略、破产、改制、兼并重组、资产调整、产权转让、对外投资、利益调配、机构调整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企业党的建设和安全稳定的重大决策，以及其他重大决策事项。
重要人事任免	企业直接管理的领导人员以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的职务调查事项。	企业中层以上经营管理人员和下属企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任免、聘用、解除聘用和后备人选的确定，向控股和参股企业委派股东代表，推荐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和经理、财务负责人，以及其他重大项目安排事项。
重大项目安排	对企业资产规模、资本结构、盈利能力以及生产装备、技术状况等产生重要影响的项目的设立和安排。	年度投资计划，融资、担保项目，期权、期货等金融衍生业务，重要设备和技术引进，采购大宗物资和购买服务，重大工程建设项目，以及其他重大项目安排事项。
大额度资金运作	超过由企业或者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所规定的企业领导人员有权调动、使用的资金限额的资金调动和使用。	年度预算内大额度资金调动和使用，超预算的资金调动和使用，对外大额捐赠、赞助，以及其他大额度资金运作事项。

“讨论前置”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步骤得以实现：（1）在提交董事会、经理层决议之前，党组织首先通过党委会或者常委会的形式进行研究讨论；党组织研究决定否决的，该事项不再进入董事会、经理层进行决议。（2）党组织研究通过的，在正式提交董事会、经理层决议前，董事会、经理层中的党组织成员应当先就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与其他成员进行沟通。（3）正式提交董事会、经理层决议时，董事会、经理层中的党组织成员应当充分表达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并在决议后将结果及时向党组织报告。（4）若发现拟作出的决议可能违反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法律法规，可能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时，应及时通过个人提出撤销或者暂缓决议的意见、党组织反馈意见和报告上级党组织等方式进行纠正。

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认为党组织的“讨论前置”仅针对“三重一大”事项的政治方面，仅享有否决权，

而不能直接作出决策，最终的决策应经由董事会或经理层对经济方面加以研究后作出。



（二）国有相对控股公司和国有参股公司

根据《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第三十九条：“国有资本相对控股并具有实际控制力的企业，结合实际参照本条例执行。”对于国有相对控股公司，政策法规未明确规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但应当结合实际参照适用该条例，与

其他股东主动深入沟通，积极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和“三重一大、讨论前置”。暂不具备推行条件的，可采取配备素质全面过硬的党委书记、建强党委班子，将董事会、经理层人员培养发展成为党员等方式发挥作用。

对于国有参股公司，由于国有股权占比较小，我们认为应结合公司股权结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与其他股东沟通释明的方式，具体开展工作。

三、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

（一）区分国有独资、全资、绝对控股公司，国有相对控股公司与国有参股公司

2017年出台的《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规定：1. 对于国有独资、全资和绝对控股公司，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系法定义务。公司章程中应就党组织单设一章，明确党建工作总体要求，写明党组织的设置形式、地位作用、职责权限，明确党委（党组）研究讨论企业重大问题的运行机制等。2. 对于国有相对控股公司，由于资本构成多元、管理模式多样，要结合企业股权结构、经营管理实际，区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不同情况，注意听取其他股东意见，做好释疑解惑工作，把党建工作基本要求写入公司章程，防止简单化、一刀切。

2021年出台的《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进一步规定：1. 国家出资并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监管的国有独资、全资和绝对控股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和制定程序。2. 国有相对控股公司需结合企业股权结构、经营管理等实际，充分听取其他股东的意见，参照有关规定和本管理办法第九条的内容把党建工作基本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较之2017年《关于扎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对国有相对控股公司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的要求更加明确。至于国有参股公司，该管理办法未提及，仍应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二）与《公司法》相比，根据《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国有独资、全资和绝对控股公司章程中涉及党组织的内容

《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规定国有企业公司章程一般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一）总则；（二）经营宗旨、范围和期限；（三）出资人机构或股东、股东会（包括股东大会，下同）；（四）公司党组织；（五）董事会；（六）经理层；（七）监事会（监事）；（八）职工民主管理与劳动人事制度；（九）财务、会计、审计与法律顾问制度；（十）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十一）附则。该办法规定的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内容基本都在《公司法》范畴内，其特殊之处主要在于对党组织、职工民主管理与劳动人事制度设置专门条款，以及对各治理机构作出了更细致的规定，汇总如下表：

总 则
明确公司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设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提供基础保障等。
公司党组织
1. 党组织的设立，产生方式及任期，人员构成。
2. 设立公司党委（党组）的国有企业明确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设立公司党支部（党总支）的国有企业明确公司党支部（党总支）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工作，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并列举党组织的主要职责。
3. 党委（党组）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并列举涉及的主要事项。 具有人财物重大事项决策权且不设党委的独立法人企业的党支部（党总支），一般由党员负责人担任书记和委员，由党支部（党总支）对企业重大事项进行集体研究把关。
4. 明确党委（党组）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及有关要求。

对于党组织参与国企公司治理的主题，仍有较多值得研究的内容，例如党委（党组）研究讨论事项清单的制定、国有上市公司中党组织的参与等。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推进人民法院 诉讼服务工作机制 和体系强化之构想

○钟胜荣 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

诉讼服务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最先接触法院的“窗口”，是评价法院工作形象的“第一道关口”，另一方面又承担了为审判工作提供更好服务的职责，承载了指导协调多元解纷、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等功能，因此诉讼服务工作机制和体系的改革强化、诉讼服务质效的提升尤其应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一、诉讼服务内涵的发展及诉讼服务工作机制和体系改革强化的目标

诉讼服务的内涵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要求也越来越高。201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下称《五五改革纲要》）提出，将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诉讼服务制度体系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包括加强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深化涉诉信访机制改革等。2020年7月2日，周强院长进一步强调“要以人民群众满意度为标准，以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为落脚点，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诉讼服务与诉讼服务工作机制和体系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载体的关系，随着前者内涵的丰富发展，后者必须相应改革强化。强化后的诉讼服务工作机制和体系应当将两个“一站式”工作纳入到一个体系即诉讼服务工作体系内融合开展，进一步增强四项功能即“窗口服务”“畅联督导”“形象塑造”和“多元解纷”功能，从而满足“两个目标要求”，即有效服务于审判执行工作和党委中心工作，有效服务于社会和人民群众，为此，应当遵循“强组织、稳结构、优服务、深融合、长发展”的基本路径。

二、“强组织”——设立“诉讼服务局”，对外办公场所同时加挂“诉讼服务中心”“多元解纷指导协调中心”牌子

建立适应实际需要的严密组织机构是确保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和保障。目前各地法院诉讼服务依托立案庭开展并加挂“诉讼服务中心”牌子的机制模式存在以下弊端：首先，立案庭的原有职责是承担立案、申诉审查、诉前保全、管辖异议二审裁定等工作，但诉讼服务除了前述工作，还包括诉前联调、多元解纷指导协调、信访处理、联络督导等工作，故从名称上看，由立案庭负责诉讼服务工作已不合适；其次，诉讼服务需要协调业务庭（指审判庭和执行局）的力量参与，且包含了对业务庭的督导，但立案庭与业务庭是平级关系（比执行局低半级），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协调、督导工作的开展，难以形成畅通的“一盘棋”模式；再次，201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一

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对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融入党委和政府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建设、完善诉前多元解纷联动衔接机制、完善诉调一体对接机制、加强涉诉信访工作等，前述工作复杂多样、政策性强，需要与党委政府及社会组织密切联系，故再像目前实践中由立案庭统一实施，显然不妥。根据《五五改革纲要》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之一是深化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构建优化协同高效的法院组织体系和机构职能体系”方针，应尽快进行以下机构改革，推动诉讼服务机构从“散、弱”到“集、强”的转变：

（一）设立“诉讼服务局”

一些国家的法院早就设立了专门诉讼服务机构，如英国于2005年4月成立了“皇家法院服务局”，2011年改组为“皇家法院及审裁处服务局”。我国法院应加紧设立专门的“诉讼服务局”，定位为专业部门，级别比普通业务庭高半级，与执行局同级；局长须是审委会委员，尽量设两名副局长，一名副局长兼任立案庭庭长、主管原来立案庭工作，另一副局长主管立案庭之外的各组工作。在将来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法官法》时，统一将局长、副局长增加列入院长提请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公布的人员范围。在内部领导层级上，形成“局一庭+组”两级架构模式，各组组长尽量由立案庭副庭长兼任。同时，刻制“某某法院诉讼服务局”印章，在开展立案庭职责范围内工作时使用原来的立案庭印章，在开展其他工作时使用诉讼服务局印章。

（二）对外办公场所标识的安排

对外挂“诉讼服务局”牌子，同时加挂“诉讼服务中心”“多元解纷指导协调中心”两块牌子或镌刻字样，以便于宣传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工作。

三、“稳结构”——在“局一庭+组”两级架构模式下设立“一庭多组”，注意稳住“组”的架构和人员，定岗定员定责，确保稳定运行

（一）关于“一庭多组”的设置

诉讼服务局下设立案庭和多组，立案庭承担原有的立案、申诉审查、管辖异议二审裁定等工作，另外设立保全组、多元解纷指导协调组、联络督导组（含12368热线）、信访组。各组组长尽量由立案庭副庭

长兼任，一名副庭长兼任的组长原则上不超过两个。信访组可由各业务庭法官轮值协助，其他人员应是本局人员，一人原则上不兼任超过两个组的组员，法官可交流配合使用。设置说明如下：

1. 立案庭。仍负责立案（含诉讼引导）、申诉审查、管辖异议二审裁定等工作。原来的诉前保全划归保全组负责。

2. 保全组。实行“集约办理”保全的模式，保全组除负责传统的诉前保全（含裁定和执行）外，亦负责在立案时提出的大部分诉讼保全（含裁定和执行），专业难度大的少部分诉讼保全申请（如知识产权案件中的行为保全）移送审判庭处理。保全裁定可由一名法官作出，重大案件由合议庭作出。保全担保的审核亦应由本组承担。实践中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实行此模式已十多年，社会评价好，值得借鉴。

3. 多元解纷指导协调组。负责以下工作：一是诉前联调（含一审、二审，由调解员具体承担，疑难复杂案件由法官介入指导，调解成功的计入法官业绩），司法确认；二是调解员的选聘、联络和专业培训、调解指导（审判庭配合）；三是就多元解纷工作对接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

4. 联络督导组（含12368热线）。负责以下工作：一是协调联系业务庭法官尤其是法官助理。诉讼服务窗口是“固定窗口”，业务庭助理是“流动窗口”，两个窗口都事关法院形象。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业务庭助理休假或联系不上的问题，应当允许当事人前往诉讼服务中心或拨打热线请求代为转达联络要求。二是记录收集当事人反映的问题，对于涉及工作作风的问题（如案件久拖不结、态度粗暴等），反馈给相关业务庭领导；对于涉及工作纪律的问题（如违法审判执行等），反馈给纪检监察室。三是定期（至少每月一次）对收集的对审判执行和其他工作的意见建议形成书面报告，提出分析意见及对策，呈报院党组参考。

5. 信访组。负责处理不服生效判决裁定的来信来访、跟进后续处理工作，处理投诉反映，对接业务庭安排信访值班法官，对接律师协会开展驻点志愿律师的值班和培训工作，就重大敏感信访案件及接访中发现的问题起草报告，参加本院涉及信访的工作会议，受院党组委派参加党委政府的相关会议，对接访工作中发现符合司法

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进行提示指导、审查、报批等。

（二）关于对外办公场所的窗口设置

除设立多个立案窗口外，上述各组每组至少设立一个对外办事窗口，窗口设置明显的组别标识，实行“首问负责制”；同时实行AB角制，每个窗口必须保证有人值班。同时，设置若干调解室、接待室和小型审判法庭，以便开展调解和司法确认工作。

（三）关于是否设置送达组、其他事务组和执行事务中心

前述工作仍由原来的机构和人员承办（如审判庭、司法事务室、执行局），诉讼服务局不设前述事务组，执行事务中心也不入驻诉讼服务中心。

四、“优服务”——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围绕“质量和效率”要求，为社会和群众提供优质服务

肖扬同志早在2001年1月就在全中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上指出“公正与效率是二十一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2020年5月周强院长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价值追求”。这一主题和追求反映到诉讼服务工作上，就是要紧紧围绕“质量和效率”要求，认真听取、回应群众的呼声意见，随时直面解决问题，按照“全面、细致、精准、高效”四结合的标准为社会和群众提供优质服务。除开展好日常工作外，应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和细化立案阶段的诉讼指引工作

诉讼指引应进一步“精细化”、增强指引效果、服务审判。一是按案件类别制定详细的起诉状参考模版。如民事类可分为离婚、人身损害、交通事故等民事纠纷类以及特别程序类，行政类可分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行政认定、违法行政行为或不作为等几类。二是按案件类别制定详细的举证指引单。制作后根据案件类别向咨询人员发放并向其讲解，指导当事人充分搜集、提交证据。三是制定诉讼流程图表。详细阐明联调、立案、一审、上诉、二审、执行阶段的程序，让当事人有大概了解。四是引导当事人寻求专业帮助。发现案件较为复杂、原告又无法正确提出诉讼主张、提交证据的，应提醒其聘请专业律师代理；对于初步判断原告可能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应提醒其尝试申请法律援助并向其提供法律援助指引单（指

引单由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给法院窗口，列明可申请案件类型、申请条件、申请程序）。

（二）统一制定并上网公示立案标准和材料清单标准

首先统一标准，对于立案需提交的材料份数作出要求，对立案需填写的《当事人提交材料清单》《证据目录及说明》《送达地址确认书》《原告提供被告、第三人地址线索书》等文书制定统一的模版，至少应在同一地级市范围内做到严格统一；其次应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通过官网及官微公布前述文书的电子版，当事人提前下载打印填妥后再进行立案，提高立案效率，便于将来业务庭审阅。

（三）加强“12368”热线的宣传，进一步提升热线的作用

具体可在发放《受理案件通知书》时在通知书上注明此热线，并注明当事人在将来遇到联系业务庭人员不顺畅等问题时可直接拨打此热线反映。此热线是面向群众的“云端窗口”，是收集、反馈信息的“信息池”和“中转站”，同时也是监督工作、纠正错误的“督导台”，通过此平台定期汇总信息并对这些信息作分析，可准确了解工作中的问题，研判工作方向。

（四）为调解和审判工作提供基础延伸服务

一是积极引导诉讼参加人提交类案判例。在立案阶段发送《提供类案判例告知书》提示鼓励他们提交类案判例，促进调解，提高审判质量。二是提供诉讼文书的电子版转化服务。设置专门工作邮箱或配备可直接插接U盘的电脑，接收诉讼参加人文书电子版后再转成内部文档使用，对此应首先考虑由各业务庭承担，如果各业务庭不具备条件，则由诉讼服务中心作为中转站开展前述工作，转化成内部文档后再发送给业务庭。

（五）进一步提高保全工作效率，缩短保全完成时限

为解决保全速度偏慢的问题，除实行前述的“集约办理”模式外，还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改进：一是在硬件设施保障方面，保全组应配备载有网上查控系统的电脑1-2台，确保大部分保全工作足不出户即可完成，同时配备车辆2辆以上（车辆不足的可要求申请人提供），确保现场保全工作及时完成。二是在具体运作程序方面，尽量将每个环节（移交材料审核、制作保全

文书、移交执行等）的衔接时间压缩在半个工作日内。

五、“深融合”——与智慧法院建设、提升审判执行质效、多元解纷、加强诉源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工作深度融合开展，提升其司法能动效能

（一）与“智慧法院建设”深度融合开展

司法体制改革与智慧法院建设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诉讼服务和多元解纷工作在与智慧法院建设融合开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如网上立案、移动微法院等技术的推广，前者为后者提供改进优化的源动力，后者对前者提供智慧和科技支持，两者之间应相互促进、共同优化。目前两者尚有进一步融合的空间，如“移动微法院”还应继续优化，应在系统功能区增加“联调视频会议”功能，减少当事人到法院现场调解的奔波之苦；为免去信访人亲自到法院沟通信访的麻烦，应在系统功能区中增加“信访”版块，版块中除应有案号、当事人、办理进度等基本信息供查询外，还应设置“信访视频会议”功能，接访法官、来访人、对方当事人等可通过此进行多方视频对话，提出和交换意见。又如应尽快全面推动法院立案系统与公安人口查询系统的对接，法院通过联接系统即可查询打印被告身份信息。

（二）与“提升审判执行工作质量和效率”深度融合开展

诉讼服务局对于联络督导组、信访组在日常工作中收集到的涉及审判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要克服“说了就过了，听了就过了”的消极意识，定期（至少每月一次）总结并向院党组汇报，提出完善工作机制的建议，便于党组准确掌握全局、作出部署。

（三）与“多元解纷工作”深度融合开展

首先要坚持将多元解纷工作和诉讼服务工作纳入到一个体系即诉讼服务工作体系内融合开展，诉讼服务局要切实承担起此项工作的领导、统筹和推动职能，对内有效协调本院各部门的力量，对外有效协调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的力量，确保多元解纷工作有组织、有效率进行，打造此项工作的“高地”。其次要细化实化措施、着力提升多元解纷的实效，如推动落实调解人员补贴、成立市场化调解组织、调解适当收费、提高调解员专业素质等，确保调解人员“有动力”也

“有能力”开展调解。除扩大律师调解员队伍外，还应通过法律知识培训、提供常见案例指导等方法强化，业务庭应积极配合支持。再次，对于某段时期集中涌现的难度较大的案件，诉讼服务局要协调对口业务庭人员靠前指导调解，如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批量劳动争议、房屋租赁合同等纠纷，争取促成成功调解一批，然后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广泛宣传，扩大战果。

（四）与“加强诉源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开展

主要抓好以下工作：一是突出普法宣传的“精准化”，将宣传延伸到可能引发纠纷的各项源头。如向银行提供信用卡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法律规定及案例宣传单，由银行向业务申请人发放提醒；又如按行业特点将常用的法律知识和常见案例分别汇编成读本，交由该行业向行业人员进行培训或发放宣传。二是要加强案例宣传。案例远比法条更容易被接受，业务庭在作出有普遍示范意义的生效裁判后，要及时通报给诉讼服务局交由媒体广泛宣传。三是完善信访大数据平台，实现对信访案件的科学管理。对内而言，各级法院要建立起本单位的数据平台，使其起到“本单位信访信息汇集池”的作用，逐级逐阶段完善涉诉信访信息资料，并实现与上下级法院信息平台的对接，确保“纵向贯通”；对外而言，各地法院要将本单位数据平台与本地其他信访信息平台（如党委、人大、政府平台）之间对接共享，确保“横向贯通”，共同服务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四是加强对信访信息的研究利用，为促进社会治理、服务党委中心工作发挥参谋作用。定期对信息进行了整理、研判，积极向有关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或向党委、政府提出完善建议，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贡献司法力量。

六、“长发展”——立足长远，建立健全配套规章制度、创设长效机制并确保落地实施，为诉讼服务工作体系长期规范稳定运行提供保障

诉讼服务工作体系建立后，必须尽快建立健全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创设长效机制并落地实施，具体包括：

（一）健全岗位责任制度

诉讼服务局设立后，要根据“局一庭+组”两级架构要求将岗位责任的范围扩展至全体人员，包括正

副局长、立案庭正副庭长、各组正副组长、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实现职责规制全覆盖。

（二）健全各项工作制度

一是工作规程，按具体工作种类细分为立案、保全、多元解纷指导协调、联络督导、12368热线、信访等多项工作规程，规程详细规定具体流程、审查标准、材料清单格式、具体要求、注意事项等，列明行为、语言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提升文明形象。二是工作例会制度，包括局务会、庭务会、组务会制度，局、庭、组全体会议制度，工作总结会制度，重大案件事件通报会制度等等。三是外部联络会议及交流研讨培训制度。四是外部“联络员”“调研员”制度。选聘思想觉悟高、业务素质好、熟悉某领域情况的“联络员”“调研员”，随时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针对部分课题进行联合调研，有效借助“外脑”“外力”，提升工作效果。

（三）健全业绩考核制度和奖励制度

诉讼服务部门的工作特点是以事务性工作为主而且繁杂量大，要“因岗施策”，针对每个岗位制定相适应的考核奖励制度，如立案岗位主要考虑审查立案数量，管辖异议审理岗位主要考虑办结案件数量，信访岗位主要考虑接待数量和成功化解信访纠纷的数量（可将信访列内部案号以便统计）。此外，为体现效果导向、推动工作“量一质一效”发展，应将以下情形列入业绩奖励范围：成功化解重大信访纠纷，成功指导调解重大疑难案件或批量案件，撰写工作总结分析报告或建议被本部门或本院采纳，撰写信息通报或司法建议被党委、政府、有关组织采纳或被有关刊物转载或媒体报道，发表调研论文，普法宣传成绩突出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方针给人民法院赋予了新的司法职能，也为司法体制综合改革赋予了新的任务。强化诉讼服务工作机制和体系是前述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首要关口”，诉讼服务将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和期待，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大有作为”。通过不断增强自身素质并改进优化诉讼服务工作机制和体系，进一步激发潜能、提升工作质效，诉讼服务工作一定能在人民法院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工作中能有效地体现应有的“诉服担当”，发挥应有的“诉服效能”。

华澳信托民事赔偿案的法律思考

——基于刑民交叉视角和程序法的展开

○安健 陈铭 陈凯君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一、案情概述

2013年，犯罪分子陈成志等人为骗取投资人的钱财，先伪造杭州保障房项目及相关文件，后在上海设立多家有限合伙企业，并安排其任职法定代表人的杭州某公司担任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随后，通过上述合伙企业与华澳信托公司签订“华澳·浙江联众贷款项目单一资金信托合同”，诱骗投资人购买，涉案金额共计2.8亿元，并通过信托通道业务款项打到犯罪分子关联公司的账户。期间，华澳信托受犯罪分子所托，出具了一份《项目风险排查报告》，认定项目风险可控。尔后投资人的钱财被犯罪分子转移且挥霍一空。2015年公安机关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侦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判决上述被告人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该案业已生效。但由于上述涉案钱款多数已被犯罪分子转移并挥霍殆尽，导致投资人的2.3亿元款项难以通过刑

事追赃得到赔偿。在该案审理过程中，25名该项目投资人以被害人身份委托律师参与了相关诉讼过程。

该刑事案件审结后，涉案投资人（该刑事案件被害人）委托律师以原告身份起诉华澳信托，要求华澳信托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该民事案件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上海金融法院二审后，法院最终认定华澳信托在有关被动型信托事务管理过程中存在多处重大过错情形，并据此判定华澳信托对原告在不能获得刑事赔偿的范围内承担不超过20%的补充赔偿责任。

该案从民事起诉到审理乃至判决的最终生效，是一起与刑事案件相关联的民事赔偿案。由于案涉的华澳信托，属于金融机构，在当前资本金融市场依法监管日渐趋严的大背景下，该案引起不少业界同仁的关注。有关的审理和判决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资本金融市场的相关机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风向标，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本文尝试从刑民交叉的角度，对

华澳信托民事赔偿案件作梳理。

二、问题的提出

（一）关于法院受理华澳信托民事赔偿案件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一事不再理原则特指基于同一个事实的案件不能被两次裁判，其目的是保证法院审判活动的稳定性和保障诉讼效率。我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禁止重复起诉”的要件，这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民事诉讼领域的重要体现，而在刑事领域，虽未以明文规定明确这一原则，但从保障公民的人权角度出发，一事不再理原则理应同样适用。近年来与经济犯罪有关的民商事案件大幅度增加，刑事和民事案件事实复杂交织，利用单一的刑事或民事法律关系分析已不能穷尽案件事实，因此，如何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理解与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是不能回避且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以华澳信托的系列民事赔偿案件为例，投资人既在前述刑事案件中以被害人的身份参加了庭审，同时在本系列民事案件中，又以民事原告的身份起诉被告华澳信托。这一做法是否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基本法律原则呢？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①及《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集资参与人权利保障问题的相关规定^②来看，如果刑案和民案的当事人是相同的，且审理的相关事实是同一事实，则人民法院在受理相关案件时应当严格依照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刑事案件中，华澳信托只是作为被犯罪分子利用的工具，并未被公诉机关列为该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共同被告人。民事案件审理的核心是华澳信托在本次信托业务活动中的过错问题，与刑案被告人陈

成志的犯罪活动并非同一事实。

基于此，我们认为，本案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

（二）关于相关案件审理程序当中的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先民后刑问题

通常而言，在法院涉及刑民交叉的案件时，主要有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先民后刑等几种做法。其中，先刑后民是主导原则。在华澳信托民事赔偿案件中，在前述刑事案件审结之后，投资人与华澳信托之间的系列民事赔偿案件陆续开庭审理，法院在审理程序上适用的是先刑后民的审理程序。

究其原因，以我们通过检索获得的投资人顾立群起诉华澳信托民事赔偿案件的判决书为例，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相关一审民事判决书显示，顾立群向法院提交的30项证据中，有不少系属于刑事案件的相关证据材料，其中包括涉案数名被告人的讯问笔录、华澳信托员工的相关询问笔录、华澳信托向公安机关递交的情况说明、相关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起诉书等等。以上刑案证据材料，系该民事案件中法院认定华澳信托在办理信托业务时存在重大过错的核心证据。显然，法院要查明华澳信托在办理该信托业务时是否存在过错情形，必须要依据相关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加以判定。在这种情形之下，法院审理相关的系列民事赔偿案件，在审理程序上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是非常合适也是必要的。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资本证券金融市场的治理整顿，维护好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座谈会纪要》文件中，明确取消了把相关机关的行政处罚或者生效刑事判决作为当事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基于上述的文件和指引，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法院在审理程序方面，则会逐渐从先刑后民原则调整为刑民并行或者先民后刑的审理程序。

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②《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过及时公布案件进展、涉案资产处置情况等方式，依法保障集资参与人的合法权利。集资参与人可以推选代表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代表人。人民法院可以视案件情况决定集资参与人代表人参加或者旁听庭审，对集资参与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等请求不予受理。

取消了前置程序，对于广大的投资人而言，通过及时提起诉讼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无疑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正如之前列举的顾立群民事赔偿案所提到的那样，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投资人等原告要举证证明被告在从事相关民事活动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大小以及与造成损失之间的关系等等，在证据方面往往要高度依赖行政监管机关的调查结论或者法院的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想见，由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有限，难以举证。如此一来，虽然投资人能够比较快地通过民事立案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相关的实体审理和获得赔偿，则会耗时不短。这也提醒我们在办理相关的民事赔偿诉讼案件时，需要认真梳理案件证据材料，必要时及时申请法院调查取证。

（三）关于华澳信托民事赔偿案件当中的证据认定和转化问题

同样以顾立群民事赔偿案为例，从一审民事判决书来看，原告为证明其诉请提供了不少来源于刑事案件的证据。同时，原告顾立群的代理律师均为前述刑事案件受害人的代理律师，上述证据材料是直接从前代理的刑事案件卷宗材料中经过筛选作为民事赔偿诉讼案件的证据提交的还是申请法院调取的，这里涉及到民事证据的认定以及与刑事证据之间的转换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关于证据的转化仅规定了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向刑事证据的转化情形，同时还规定该种证据转化还需要满足法庭查证属实、收集程序合法的条件，即证据的转化要同时兼顾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未提及刑事证据和民事证据的转化问题，那么涉及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依据刑事证据具有更高的证明标准而认为相关刑事证据可以不经质证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具体到顾立群案中，在原告律师向法院提交了包含多项刑事诉讼证据的材料之后，在庭审中，被告华澳信托对以上证据材料逐项进行了质证，法院也在相关证据材料经过双方质证后通过审理查明的方式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进行了确认。由此可见，相关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应当需要双方质证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03条规定：“证

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未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由此，可以得知质证是庭审必经环节，除非该事实是民诉法司法解释规定的免证事实，即便刑事证据有更高的证明标准，在民事案件中也需质证。

除此之外，本案还涉及到证据收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5条及《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第37条的规定，相关的刑事证据是需要严格保密的。

由于投资人顾立群的代理律师为刑民两案的代理人，并且参加了全部的庭审活动，因此，我们合理地认为，律师是有该刑事案件的全部卷宗材料的，如果上述民事赔偿案件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是由律师直接从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当中经过筛选作为民事赔偿案件的原告证据向法院提交的话，那么就可能存在是否合法合规的问题。如果以上证据材料是向法院申请依职权调取获得的，那么基于资本证券金融市场的刑事案件卷宗材料数量庞杂的问题，是全案调取还是选择性调取？又加之此类案件往往投资人人数众多，如果都要求申请法院调取相关刑事诉讼的材料，事实上就可能造成刑事案件卷宗材料的被动扩散。因此，如何协调此类刑民交叉案件当中刑事证据与民事证据的认定和转换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实务问题。

（四）关于刑事生效判决的财产刑执行与民事生效裁判的执行衔接问题

仍以顾立群诉华澳信托民事赔偿案件为例，依据已经生效的上海两级法院的民事裁判结果，华澳信托应在民事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顾立群根据相关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华澳信托对不超过损失款项20%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由此带出一个问题，刑事赔偿以什么时间作为终了的计算时日？因为如果不能够确定刑事生效判决的财产刑执行终了之日，就无法启动申请华澳信托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民事执行。

顾立群案确定的补充责任，突破了刑事追赃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如何确定相应的民事赔偿金额的局限，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如果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在刑事诉

讼过程中不能够得到全额的补偿，则有权通过相应的民事诉讼获得全部或者部分的赔偿，这对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具有正面意义。

但在执行问题上，申请人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因有关的刑事追赃程序仍在持续当中，相关金额仍不能确定。人民法院认定顾立群申请民事执行的条件还不具备，并驳回其执行申请。这就导致此类具有刑民交叉因素的民事赔偿案件在涉及民事执行的实务操作中存在一个较大的难题，如果相关刑事案件裁判的追赃执行没有终了，则民事裁判执行就变得遥遥无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3条：“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的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执行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执结，非诉执行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执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还需延长的，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刑事追赃往往需历经几个时间段。首先，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部门将相关材料移送至执行机构，执行机构何时立案，法条仅表述为“及时”二字，法律并未明确具体期限；其次，立案后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的期限为六个月，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但对于具体延长的期限没有规定，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即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还需延长的，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备案，这一规定对延长的期限和延长的次数均未作出明确规定，这会导致实践中对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结果变得遥遥无期。

如何破解有关此类刑事判决的财产刑执行与民事裁判执行的衔接问题？我们通过检索有关刑事裁判涉财产执行案件的情况，发现一些刑事执行法院在发现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时，会出具结案通知书，以此作为执行终结的依据。例如，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陈斌集资诈骗罪一案作出的结案通知书显示，因被执行人无其它财产可供执行、申请执行人书

面同意而终结本次执行。该刑事一审判决作出的日期是2015年8月，执行结案通知书显示执行的是一审判决，即本案被告人未上诉，该案于2016年2月立案，于2017年10月底执行终结，从判决之日起至执行终结历时两年多。参照该案的执行处理方式，在华澳信托的相关民事赔偿案件中，负责刑事执行的法院在依法不能查获被执行人的财产时，可以及时终结本次执行，以便投资人可以及时通过民事执行的方式获得相应的民事赔偿。

三、结语

一方面，华澳信托民事赔偿案经过上海两级法院的审理，最终确认由华澳信托对顾立群等投资人承担在刑事赔偿不能的范围内承担不超过20%的补充赔偿责任，这一判决的生效为今后类似案件如何站在投资人的角度维护被害人的权益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救济途径。

另一方面，华澳信托民事赔偿案，作为具有比较浓厚刑民交叉色彩的民事案件，和一般的民事赔偿案件相比，无论是在案件的审理还是在案件的执行过程当中，和普通的民事案件审理执行以及纯粹的刑事案件的财产刑执行差别比较大。基于此，涉及资本证券金融市场的刑民交叉案件也需要大家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研究。

参考资料：

1. 陈成志集资诈骗罪案一审刑事判决（2017）沪01刑初50号；
2. 陈成志、王霞集资诈骗二审刑事裁定（2018）沪刑终65号；
3. 顾立群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一审民事判决（2018）沪0115民初89276号；
4. 顾立群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二审民事判决（2020）沪74民终31号；
5. 顾立群与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其他执行裁定（2021）沪0115执4954号；
6. 申请执行人王建潮等与被执行人浙江永通建设有限公司、陈斌集资诈骗执行实施类结案通知书（2017）浙06执恢61号；
7. 马国、重庆五星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2019）最高法民申3261号；
8. 江山市江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雷伟程与江西四季青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吴自旺、俞小貂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2016）最高法民申425号；

上述裁判文书均援引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外销企业向内销转型时，容易忽略一些外销业务模式中较为少见的法律风险。外销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以代工贴牌为主的）价值链较短，主要覆盖采购、制造和批发等环节，没能全面延伸到研发、零售、品牌推广和售后等环节，因此对上下游一系列环节所引发的法律风险往往思想准备不足。外销企业向内销转型时应特别关注的法律风险有以下五类：营销宣传法律风险、渠道垄断法律风险、终端索赔法律风险、产

品侵权诉讼风险和市场行政监管风险等等。本文对此展开介绍，希望对正在转型的企业有所帮助。

一、营销宣传法律风险

传统外销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如果是代工业务为主，品牌宣传一般完全由海外客户负责，外销企业完全不予插手。即便有自主品牌业务的，大多也都将海外市场的品牌宣传推广交给当地经销商，而企业自己

参与不多。转型进入内销市场后，企业一般开始采用自主品牌且不得不亲自开展各类品牌推广和宣传，此时应当重点关注以下两点法律风险：

第一，对转内销产品的产地、生产者等信息应当如实介绍，避免作出虚假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广告中对商品的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成分、价格、生产者、有效期限、允诺等或者对服务的内容、提供者、形式、质量、价格、允诺等有表示的，应当准确、清楚、明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因此，企业进行广告宣传或以其他方式进行营销宣传时，不得虚构产品的产地、生产者等信息，不得误导消费者认为转内销产品为进口产品，也不得在对产品性能和功能的广告宣传上有其他虚假不实。否则，可能被市场监管部门处以高额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选择网红直播带货需谨慎。外贸企业由于过往专注于对外贸易，在国内缺乏有效、健全的销售渠道，为了快速打开营销局面，很可能选择网红直播带货这一新兴、火爆的营销方式。在与直播带货平台和网红进行合作时，应当注意以下风险：首先，流量造假。流量是直播带货的生命线，一些平台和主播为了提高议价能力，可能会采取刷热度、购买观看量等方式进行流量造假，建议企业在签约前，对网络平台、主播的热度和过往销售业绩进行充分了解，以免上当。其次，虚假刷单。目前，主播通常以直播带货的成交总额为基础，按照一定比例提取佣金，结算周期往往在带货当日或次日。一些主播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后，雇佣水军刷单，人为拔高带货销量，在企业结算佣金后再利用消费者身份退单，造成企业损失。因此，建议企业在与主播洽谈合作时，明确成交总额的构成，并将佣金尾款的支付时间延长至消费者退单周期届满以后，避免吃“哑巴亏”。

第三，更换主播。流量经济本质上是“粉丝经济”“眼球经济”，不同主播的引流能力差异巨大。如果企业选择与拥有多位主播的直播平台进行合作，切记要在合同中指定进行直播的具体主播任选，并约定平台方擅自更换主播应当承担的责任。

二、渠道垄断法律风险

外销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往往只指定一级经销商。企业的主要工作是管理一级经销商，而对于一级经销商以下的二级和三级经销商，则交给一级经销商去管理，一般只是在经销合同中要求下级经销商必须合法合规，对于当地市场下级经销关系的相关法律风险，外销企业一般并不熟悉。但是，当企业转入内销市场，便经常需要直接面对多个经销商的管理问题和线上线下渠道的协调问题，此时便有违反反垄断法

的风险。首先，企业应关注转售价格管理带来的风险。许多企业误以为限定经销商最低零售价可以避免乱价、保护品牌、维护市场秩序，但实际上，这是我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所禁止的纵向垄断协议。该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其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对限制最低售价执法最为严厉，企业需要特别注意。

其次，企业也需要注意非价格管理所带来的法律风险。纵向的非价格限制措施也存在违反《反垄断法》的风险。《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三、终端索赔法律风险

外销企业的产品在境外出售给终端用户后，如果用户存在索赔，一般都向当地零售商索赔，不会直接向中国制造商索赔，而零售商则会找当地经销商处理（或进口商处理，在许多国家，进口商被视为进口产品的制造商，承担制造商的责任）。如果是代工品牌，终端用户甚至无法核查产品的代工企业而只能向品牌商索赔。此外，外销企业一般也不直接负责当地售后，因此缺少与终端用户打交道的经验。但是，转型内销后，企业的终端销售对象变为国内的消费者，生产、

外销企业内销转型时 容易忽视的5类法律风险

○李岚 何东闽 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销售行为也直接受到我国《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制。若违反相关的规定，可能引发终端客户的索赔风险。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六条规定：“销售者销售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一）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二）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生产厂厂名和厂址；（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需要标明产品规格、等级、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以标明；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或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四）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五）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因此，企业应保证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及其包装上的标识符合上述要求。

第二，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四十三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企业应保证所生产、销售的产品的质量，确保其符合产品质量标准，避免生产、销售不合格的产品，将风险控制在源头上。

第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因此，企业应杜绝欺诈、故意侵权行为，以此规避潜在的惩罚性赔偿。

此外，在内销中遭遇用户索赔，除考虑直接法律风险，也应特别考虑媒体舆论风险，因此企业需要具

备一定的危机事件处理能力。

四、产品侵权法律风险

如果外销企业将以前给海外客户代工产品转为内销，可能会涉及专利侵权、著作权侵权、商标侵权以及合同违约等问题。

首先，如果国外委托方委托中国企业加工生产其拥有专利权的产品，当该产品转内销时，为避免侵犯原专利权人的专利权，企业应当调查该产品是否在中国境内享有相应的专利权（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以及设法获得权利人的合法授权。即便不存在以上专利权侵权等问题，外销企业还需要审查与境外客户签订的原代工合同，如果相关设计已独家授权给境外客户使用，或者约定专属于境外客户所有，则在境内使用相关设计仍将构成违约（即使相关设计由中国企业完成）。

其次，在玩具、家具、日用品等具有一定艺术性的代工产品中，可能还涉及著作权侵权问题。内销企业应注意销售此类产品可能存在的著作权侵权风险。由于著作权自创作完成之日自动取得，无需提交申请注册或获得行政机关的核准，因此一些企业往往误以为著作权不需要获得授权许可即可自由使用，从而埋下了风险隐患。实际上，实用艺术品如要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通常需要满足多个条件，例如权利人应当是伯尔尼公约成员国的“作者”、美术作品应当具有我国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该产品需要具备一定的“艺术性”等。而这些条件是否成立往往存在争议。因此，相关企业在事前应尽可能获得境外委托方的授权。如果权利人为境外委托方以外的第三人，还应当积极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

此外，商标侵权问题往往出现以下情况：第一类是侵犯国外委托方的商标权。如果国外委托方在中国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当委托加工合同履行完毕或合同解除后，外贸企业如未经授权，则无权再使用该商标，否则将面临商标侵权的风险。第二类是侵犯第三人的商标权。由于商标注册保护的地域性等多种原因，有时国外委托方虽然在境外注册了商标，但却未在中国注册商标，或者由其他相关方在中国注册商标。此时，出口转内销产品使用的商标如果与第三人在国内注册的

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则不论是否获得境外委托方的同意，内销企业都将面临侵犯第三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风险。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企业长久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其终极目的是维护企业的核心利益，因此，对于完全属于自主研发的产品，企业也需要学会使用知识产权保护自己。外销代工企业往往较少自行在境外申请各类知识产权而由境外客户进行申请，转到内销市场后，应当主动接手这些工作。对于产品专利，应当提前进行专利补足。我国将专利授予最先申请者而不是最先发明者。因此，有了新的技术发明，应尽早规划进行专利申请，而不是等到产品出来、更不需要在产品完善后再进行。与此同时，特别需要注意，专利申请获得授权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在申请前该技术方案未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发表或使用过，因此，为避免发生因自行将发明创造内容加以公开而导致丧失获得专利的情况，申请专利的时间还需要与业务部门的产品计划进行协调，在论文发表、产品公开推广或销售前，务必要完成相关专利的申请。如果前期布局不足，即便产品一开始获得市场成功，也可能被迅速模仿却苦于无法维权。

五、政府监管合规风险

外销企业从事国际贸易时，一般来说，主要风险是收款风险，至于终端市场的政府监管合规风险，一般由境外客户面对，包括与当地政府的汇报和交涉。即便遭遇监管执法，也往往由境外客户承担后再通过合同形式向中国企业索赔。产品转为内销后，企业则需要直接面对国内的监管部门。

首先，以产品质量问题为例，企业首先需确定相关产品在中国是否需要适用强制性标准，如有，则必须无条件符合该强制性标准。《标准化法》第十条规定：“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满足经济社会管理基本需要的技术要求，应当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第二十五条规定：“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服务，不得生产、销售、进口或者提供。”第三十七条规定：“生产、销售、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依照《产品质量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查处，记入信用记录，并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政府部门会主动对产品进行抽查，一旦发现不符合相关标准，可能会强制停止销售、甚至停业整顿和吊销相关证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应当自收到检验报告之日起停止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对库存的不合格产品及检验机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退回的不合格样品进行全面清理；对已出厂、销售的不合格产品依法进行处理，并向负责后处理的部门书面报告有关情况。对因标签、标志或者说明书不符合产品安全标准的产品，生产企业在采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产品安全的情况下，方可继续销售。监督抽查的产品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依照本办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处罚。”第五十条规定：“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经复查其产品仍然不合格的，由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企业在30日内进行停业整顿；整顿期满后再次复查仍不合格的，通报有关部门吊销相关证照。”

最后，相关产品如果存在安全隐患，企业还存在向政府汇报的义务和对缺陷产品实施召回的义务。《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不仅明确规定生产者和其他经营者在两种情形下有向政府部门汇报的义务（即发现消费品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死亡、严重人身伤害、重大财产损失的；或者消费品在中国境外实施召回的），严格规定汇报时限是发现上述情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汇报对象是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并且规定，如违反该汇报义务，政府可以罚款。此外，该规定第九条规定：“生产者发现消费品可能存在缺陷的，应当立即组织调查分析。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内生产者生产的消费品可能存在缺陷的，应当自发现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通知生产者开展调查分析。生产者应当按照通知要求开展调查分析，并将调查分析结果报告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调查分析认为消费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应当立即实施召回，不得隐瞒缺陷。”

因此，可以说，一旦转入内销市场，生产企业便全方位地落入政府的监管范围，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需时刻关注对政府所负的各项义务，避免遭遇行政监管调查。

居住权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实务解析

○刘艳华 王倩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民法典》新增居住权制度，深入贯彻了住有所居的理念，也是对现实社会需求做出切实的回应。笔者结合在《民法典》生效后承办的与居住权相关的真实案例^①（下称“本案”），对《民法典》中关于居住权的概述、设立、权能、灭失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探讨居住权的适用与发展。

一、居住权概述

居住权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主要为了应对婚姻家庭、继承以及保障弱势群体生活所需，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社会保障性。我国的居住权制度最早出现在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②，2001年婚姻法司法

解释^③，也规定了婚姻关系终止后，一方可以通过设立居住权的方式对另一方进行帮助。随后，居住权制度被纳入物权的讨论范畴；直到2020年《民法典》出台后，居住权制度正式被纳入物权。

根据《民法典》规定，为满足生活居住需要，当事人可通过合同约定或订立遗嘱方式获得对他人住宅合法占有、使用等权利^④。

从理论探讨到司法尝试，再到正式立法，居住权制度已具备确立的必要性。设立居住权制度，一方面可以解决特定人群居住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充分发挥住宅最本质的居住属性，进一步发挥房屋的经济效能，通过合同或遗嘱方式实现房屋价值最大化。虽然，居住权益并非新概念，《民法典》生效之前人们也可以通过意定方式设立居住权益。但是，《民法典》生效之前，居住权益无法以物权请求权的方式获得法律保障，人们通过合同约定享有的居住权益无法对抗第三人；《民法典》生效之后，通过设立合法有效的居住权，能够确保居住权人对住宅享有占有、使用权能，该权利通过登记取得，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能够有效减少纠纷，实现居住权人稳定的居住权利。

二、居住权的设立及效力问题

1. 通过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

当事人可约定住宅位置、居住条件、居住期限等以合同方式设立居住权^⑤。第一，合同需要明确双方当事人姓名及住所，并且应当通过书面方式订立居住权合同。第二，合同还应当包含住宅的具体位置。此处的“住宅”需要具备合法且满足居住的基本属性，例如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农村宅基地所建房屋等。第三，合同应约定居住条件和居住期限。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明确约定居住人的居住细则，明确可为和不可为，也可以约定具体居住期限或者附条

件的解除事由；若没有约定，则按照合理居住为限，居住期限以居住权人去世为止。

由于居住权制度的设立初衷主要适用于家事领域，即居住权主要发生在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近亲属之间，因此，居住权无偿设立是原则，在必要合同条款里并没有对报酬、违约责任等进行明确要求，意在保障具有特定身份关系人群的居住权利。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居住权的设立目的并不能局限于保障特定关系人群的居住需求，因此《民法典》增加了有偿设立为例外，即投资性居住权，当事人需要在合同中对价款、报酬、违约责任等进行详细约定，这也使得房屋居住属性及财产属性能够最大化的利用。

最后，居住权合同签订后，当事人应当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⑥。居住权合同一般自双方当事人签订后生效，但该合同效力仅及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属于债权效力；而登记生效要件是我国不动产变动的基本原则，居住权作为一项不动产他物权，继续沿用这一原则，即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后发生物权公示效力，意在保障居住权利人享有稳定、安宁居住权利且能够对抗善意第三人。

2. 通过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

住宅所有权人可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为他人设立居住权^⑦。在本案中，古某便是通过遗嘱方式设立的居住权，古某生前在自书遗嘱中写到：“遗嘱订立人古某在百年之后将其名下某房屋留给女儿古月居住至其百年之后，儿子古一继承该房屋的100%所有权”，那么在《民法典》生效之前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在《民法典》生效之后当然有效吗？根据法律规定，在《民法典》实施之前的法律事实且当时没有法律规定而在《民法典》有规定的，可以适用《民法典》。再加上，遗嘱具有高度的意思自治，在遗嘱合法有效的基础上，也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遗愿，这符合民事行

①本案系笔者承办，现已调解结案，由于涉及当事人隐私，部分信息已作处理。本案被继承人古某生前订立自书遗嘱，将其名下房产留给女儿古月居住至其百年之后，该房屋所有权归儿子古一；由于古某还有其他子女，所有继承人认为该遗嘱不合理，未达成一致最终诉至法院。

②该意见第十四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居住的房屋属于一方所有，另一方以离婚后无房居住为由，要求暂住的，经查实可据情予以支持，但一般不超过两年。”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④《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⑤《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七条：“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住宅的位置；（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居住期限；（五）争议解决方法。”

⑥《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

⑦《民法典》第三百七十一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本章的有关规定。”

为的基本原则。

通过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还应当遵循继承编的法律规定。第一，通过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应当以有效遗嘱为前提。立遗嘱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实，所立遗嘱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第二，附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以履行相应义务为生效要件或者终止要件。例如，立遗嘱人可通过遗赠抚养协议方式，约定受遗赠人在其生前须履行照顾、扶养义务才能在其去世后取得居住权；也可通过遗嘱方式表明，继承人在符合某种条件的情况下丧失居住权。第三，需要以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未丧失继承权或受遗赠权为必要条件。第四，通过遗赠方式获得居住权，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做出书面接受的意思表示，若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权利。

通过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发生法律效力^⑧。与继承其他财产取得的方式一样，继承的法律效力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发生，不以物权变更登记为必要条件；同样，居住权人在被继承人死亡时，即可通过遗嘱方式取得居住权，不以居住权登记设立为生效要件，但是笔者还是建议为了避免权属争议，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有必要及时办理登记。

本案中，古某生前订立的自书遗嘱符合法定生效要件，系有效遗嘱，女儿古月亦未丧失继承权，故古月在古某去世时便合法取得古某生前住宅的居住权，儿子古一亦通过遗嘱取得该房屋所有权。由于本案其他继承人认为古某遗嘱分配不公，在其他继承人不配合的情况下，古月及古一均无法通过遗嘱办理居住权登记及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最后，诉至法院，古一通过给予其他人适当补偿的方式化解纠纷，古月也在法院调解下获得无固定期限居住权。为了避免再起纷争以及有效对抗善意第三人，我们建议古月及时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居住权登记手续。若未办理居住权登记，居住权人则可能因为第三人善意取得房屋所有权而无法继续行使居住权利。因此，办理居住权登记是非常有必要。

三、居住权人的权利义务

居住权人对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基本权利，且该权利及于住宅附属设施，以满足权利人生活所需为限。居住权人应当对住宅及生活附属设施合理使用、妥善保管。当住宅发生损害时，居住权人可基于生活居住所需，对住宅进行必要的维修，但不得对住宅造成实质性改变，不得对住宅所有权人利益造成减损，必要时当事人可通过居住权合同进行明确约定。

居住权人不得对居住权进行转让、继承^⑨。居住权设立初衷是对特定身份关系人群的帮扶、照顾，也是以无偿设立为原则，不得转让、继承也是基于居住权的人身属性决定。由于，本条规定并没有例外，即投资性居住权也需要遵从该项禁止性规定。此外，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以不得出租为原则，能出租为例外，对于出租方式等需要当事人通过合同进行明确约定。

四、居住权的灭失

当事人可通过居住权合同明确约定居住期限，或者约定附条件的灭失事由^⑩。这一规定也充分体现了当事人对民事行为意思自治原则，在有约定的情况下按照约定确定居住期限，无约定的情况下按照权利人死亡为灭失要件。此外，当事人还可约定附条件的灭失事由，即居住权灭失以某种条件成就为解除要件，例如若约定子女未成年期间对住宅享有居住权，则子女成年之后居住权自动灭失；夫妻离婚后，一方为另一方设立居住权的，可约定另一方再婚后居住权自动灭失等等。

居住权存续的最长期限则是以权利人生命为限，即使约定的居住期限未届满或者解除条件未成就，居住权自居住权人死亡时自动灭失。

除了上述期限届满及权利人死亡两点法定消灭事由以外，住宅作为居住权的重要载体，如果住宅灭失，例如自然灾害、拆除等，居住权的客体便不存在，居住权也会因此消灭。

最后，居住权灭失之后，当事人应当携带相关证明文件前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居住权注销登记，以维护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职场“小白”的实习心得

○金鑫 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

时刻保持专业的形象

律师作为一个靠专业素养谋生的职业，专业的形象是获得当事人信赖的源泉。为此，一方面要不断学习，拓宽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另一方面要注意平时的沟通技巧和形象，让委托人或其他潜在客户看到我们的专业和水准。

当然，人无完人，必定会有当事人存在疑虑而我们无法及时提供答案以展现专业素养的场合，如何扭转局面则更能体现我们的情商、应变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通过各种途径展现自己

酒香也怕巷子深，但专业能力不比靓丽的外形，不能主动吸引潜在的客户上门来。要想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将自己专业的形象展现给更多的人，就需要学会“主动出击”，通过身边的各种途径推广自己，获得他人的认可；同时，积极参加公共关系活动，也是提高个人综合素养的锻炼方式之一。

在实习过程中，我参与编辑了团队的公众号，并有幸参与律所到电建地产和深圳蔚来 house 开展民法典普法活动，对律师展现自我价值这一方面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注重总结，及时反思

不论案件的事由是否复杂，标的是否较高，对于每个案件而言，不同的事实决定了不同的目标和案件走向，也决定了我们的策略和方法。同时，每个案件处理中都一定会存在着闪光点与不足之处，而总结就是将闪光点予以保留和发扬，对不足之处进行反思和解决。

团队定期举行的案件总结分析会议，不但帮助我们分析总结，取长补短，还有助于我们及时跟进案件进展，集思广益，进而促进办案能力的提高。

我相信，在此次实习中所观察、学习和感悟的，都将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接下来的学习生活和以后的律师生涯提供巨大的帮助。

于我而言，我的实习经历是丰富多彩而富有意义的。作为一名有志于从事律师职业的“小白”，我在实习过程中亲身参与了多种类型的案件处理工作，学习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增进了对于律师职业和行业的现状与前景的了解，为将来执业打下了基础。

确立明确的目标

工作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在针对案件作具体的行动方案时，应首先确定案件想要达成的目标，以及为达成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各类诉讼、非诉讼手段，进而制定行动方案，避免直接钻入复杂多样的案件处理方式中，陷入混乱而导致无所适从。

我在刚刚接触案件时，总想着把事实看完就直接开始工作，忽视了目标导向和规划的重要性，而这样的教训和经验促使了我成长。

中立客观评价案件事实

在许多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可能是天壤之别，而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代理人，我们不可避免会出现仅站在己方当事人的角度看问题的情况，这既不利于全面清晰地了解案情，也不能对案件作出准确的把握。

与之相对的，我的老师曾教导我们“当怀疑案件事实的真实性时，首先要怀疑的就是你的当事人”。在校期间的我对此不甚理解，但在接触到更多的实务工作后愈发明白其意义。排除包括自己的委托人在内的他人的干扰，对充分把握案情至关重要。

此外，“可行”与“能行”的区别，也是我此次实习获得的一个重要启发。单纯理论性地描述“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考虑实际效果，就如同讲绝对正确的废话，对于解决当事人的实际问题并无裨益。相较于追求“绝对正确”或仅仅是法庭辩论中的优势地位，关注实际可以取得的利益并将之作为案件的核心目标则更为关键，而这一点与前述的“目标”有直接的关联，这再次强调了目标导向的重要性。

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条第一款：“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⑨《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条：“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⑩《民法典》第三百七十条：“居住权期限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三胎时代， 谈谈女性生育权 和不生育的自由

○魏倩 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



我国蜜绝对是那种很有主见和倔强的人，但仍然被周围人有意无意地劝过很多次：再生一个吧！原因太丰富了：一个孩子太孤单了，多生一个陪陪他；你的学霸基因那么好，不多生一个可惜了；你家小朋友教育的那么好，多生一个呗；爸爸从小就羡慕那些有好几个兄弟的；一个孩子，以后过年都冷冷清清的；你只管生出来，我帮你带孩子……

有些劝说源于善意，有些劝说源于无聊，有些劝说仅仅源于没有界限感的胡扯。结合自身生育意愿，回答这个问题时，闺蜜基本没有耐心掩饰自己的情绪，也没有精力进行人际周旋，答案永远是：不可能。夫妻关系十分和谐，双方事业也都发展的不错，但闺蜜坚定地选择不再承受生育和养育的痛苦。

倔强如她，仍有各方势力冒着看臭脸的风险给予忠告，其他更温婉的女性呢？

直接谏言的人还要看“臭脸”，那些个体无法控制却时刻都在影响着个体的机构和媒体呢？

在我的观念中，生育意愿是个人的权利，即便是再好的朋友，我也不会对别人的个人选择指手画脚，所以并非借着讲故事的机会鼓励女性降低生育意愿，只是担忧，在国家和社会各界都在提倡三胎的大环境下，部分女性会直接或间接地失去不生育的自由。

严格来讲，不生育的自由属于生育权的范畴，所以，我们还是从生育权谈起，当然，最好有能力谈及法律层面。

一、谁拥有生育权？

（一）是不是只有女性才拥有生育权？女性的生育权是否包括不生育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21 修改）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从现行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男女双方均享受生育权，而且，为了照顾女性的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将不生育的自由明确写进了女性生育权的保障条款。

（二）未婚（包括离异）女性拥有生育权吗？

从权利来源的角度讲，生育权是自然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源于人类繁衍的本能，即是法律没有特别规定进行确认，一切自然人都应当拥有生育权。我们目前的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将生育和婚姻联系在一起，婚姻在现实社会中几乎已经成为生育的前提，未婚（包括离异）女性，甚至未婚男性的生育权在事实层面被剥夺。如果只是笼统地说未婚人士的生育权被剥夺，似乎也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但具体到个体层面，其残酷性就可见一斑：无论一个人是主动或者被动选择不婚，她/他就在事实层面上失去了繁衍后代的权利。

从法律的角度讲，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明确的生育权的主体“妇女”，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的生育权的主体“公民”，拥有生育权的主体显然都没有排除未婚女性，但事实上，未婚女性生育权在实践中显然受到很多阻碍，比如《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①，而其中《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通篇都是规定“受者夫妇”，并没有给“单身妇女”留下任何空间。

总结起来，未婚（包括离异）女性的生育权就充满了悖论：无论从权利来源还是法律规定的角度讲，未婚（包括离异）女性都拥有生育权，但无论从社会伦理道德层面还是社会实践的角度讲，未婚（包括离异）女性拥有的生育权都难以实现。

（三）女性不生育的自由体现在哪些方面？

如果女性不生育的自由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概念层面，就无法看清楚现实社会中可能存在哪些侵犯女性不生育自由的行为，还是要具体说说。粗略总结，女性不生育的自由至少应该包括：有权决定暂时不生育孩子，即可以自由合法地选择避孕及备孕的方式；有权决定永远不再生育孩子，即可以自由合法地选择绝育及绝育的方式；有权决定终止妊娠。

目前，我国妇女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社会对生育意愿的倡导，不排除某些区域某些家庭在响应这一社会新风尚方面超过法律界限，采取限制女性避孕或堕胎的方式实现生育目的。

二、夫妻之间，谁的生育权更优？

（一）谁在生育中承担的更多？

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但还是要提出来，无非就是要强调：在生育的妊娠和分娩过程中，女性承担了全部的生理风险、生理痛苦和绝大部分的心理压力。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女性不生育的自由才显得如此的重要。

（二）男女双方平等地拥有生育权吗？

从权利的属性上讲，生育权属于人格权，无论男女，双方的人格权利都应当是平等的。即使这个问题存在广泛的争议，但我认为男女双方平等地拥有生育权。

（三）谁拥有生育决定权？

女性。男女双方平等地拥有生育权和平等地拥有生育决定权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生育决定权和女性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女性在受孕后，胎儿构成了女性身体的组成部分。男性虽然拥有和女性平等的生育权，但男性的生育权显然无法对抗女性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可以终止妊娠，而无需向配偶支付赔偿；男性如果强行终止配偶妊娠，就侵犯了女性的人身自由权和生命健康权，这不仅是民事上的侵权，如果造成严重后果，有刑事犯罪风险。

三、夫妻之间因生育权问题发生纠纷如何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三款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当准予离婚。这条司法解释，足以体现生育权的重要性。毕竟，与生育权冲突并列的其它几种感情破裂的法定事由分别是：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为什么法律会规定“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足以证明感情确已破裂，法院调解无效则应当准予离婚呢？生育权属于人格权，是民事主体的绝对权力，其他权利主体都负有不得侵犯的不作为义务。如果配偶之间“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不愿意互相配合，显然是在侵犯对方生育权。如果夫妻间互相侵犯生育权的行为无法调解，在一方通过提起离婚诉讼维护其生育权的前提下，法律不能放任这种侵犯人格权的行为一直持续下去，只能维护诉求方从婚姻中解脱的权利，以达到维护双方生育权的效果。

^①参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2003 年新修）三、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中的第（十三）项规定。

深圳律协召开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2021年11月28日，深圳律协召开第十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蒋溪林等出席会议，第十一届理事会全体成员参加会议，第七届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会议。蒋溪林局长寄语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要“讲政治，讲团结，守规矩，守初心，谋发展，谋创新”，努力提升深圳律师业的综合竞争力。张斌会长表示将团结理事团队，以问题为导向，共同服务律师业高质量发展；团结律师代表，共同改善执业生态，营造和谐的执业氛围。他提出，将尽快组建协会工作团队，完成专门委员会、专

业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带领市律协迈向服务新高度。



“五才”举措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律师业高质量发展

2021年12月5日，“广东省法学会港澳基本法研究会2021年年会暨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发展法律论坛”在深成功举办，多地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大湾区涉外法律人才、大湾区城市群区域治理、前海探索规则衔接的实践、粤港澳大湾区争端解决机制、澳门特区原有法令修订等议题展开广泛讨论。深圳律协张斌会长出席论坛并致辞，他表示，深圳律协将站在“双区”建设的高度，加大国际化建设力度，以人才引领发展的核心理念，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律师业高质量发展。一是搭建平台“聚才”，将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委员会，推动“9+2”城际律协的交流与合作。二是打造体系“引才”，高标准打造与“双区”相融的律师服务体系，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法治衔接，服务深港合作大局。三是把准方向“育

才”，打造全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高地，加强深圳涉外法律服务人才培养。四是不拘一格“用才”，发挥联营所和外资所的引领作用，做好港澳律师在深执业工作。五是示范引领“留才”，推进深圳涉外法律服务的发展和体系建设，在全国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深圳律协召开第十一届会长办公会第一次会议

2021年12月10日，张斌会长主持召开第十一届会长办公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关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了第十一届专门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及区律师工作委员会的设置方案，专业委员会相关工作规则修订稿及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座谈会协办事宜等，并研究讨论会长团队分工。会议提出了新一届会长团队的六个理念，一是共建、共享、共成，构建共治的新理念；二是大联合、大团结、大外交、大发展的开放型新理念；三是一切以会员为中心的理念；四是回归专业、

回归服务，回归会员的理念；五是国际化的理念；六是深圳律师业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树立工作新理念，为工作起步奠定了基础。



市司法局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任继光检查会务筹备工作，侯昆霖秘书长认真汇报。



秘书处召开律代会工作部署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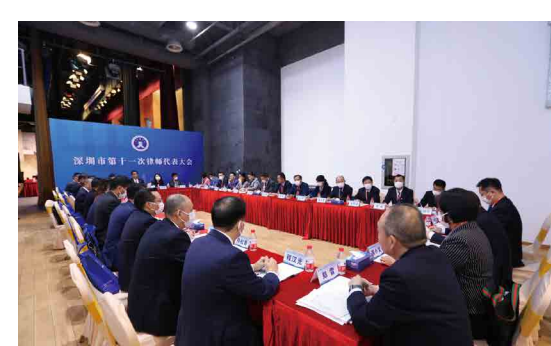
会场物资准备



清点并报告代表人数



律师代表投票



主席团会议

深圳市第十一次律师代表大会

工作花絮



现场签到



拆封后分发选票



现场进行电子计票

